

## 傅斯年先生年譜

韓復智編

### 一、傅斯年先生的先世

先生名斯年，字孟真，他的先世，世居山東省聊城縣，但遠祖則源自江西。他的初祖傅回祖，係江西省永豐縣人，於明憲宗成化（西元 1465 - 1487 年）中任冠縣（今山東冠縣）縣令。聊城於明代屬東昌府，且為府治所在地，冠縣則是東昌府的屬縣之一。從回祖到斯年先生，共歷十四世，四百七、八十年。回祖任縣令期滿，將返回故鄉，但夫人李氏不願隨行。回祖乃將七子中之三子留下侍奉夫人，自攜四子南歸。三子中有名祥者，原係次子，奉母李氏僑居聊城，其餘二子，一居冠縣，一居博平。傅回祖何以要留三子在北方？據清初人所撰的傅氏碑文記載，回祖任縣令時，頗有善政，百姓不忍其期滿離去，回祖乃留三子以撫慰之。此外，據說夫人李氏精勘輿之學，認為如卜居聊城，後世必可騰達，因此獨寓聊城，未返回江西。其後李氏歿，葬於城南，子祥因不忍遠離母親廬墓，乃在聊城落戶，從此他的子孫，世世代代都居於聊城。聊城是一人文薈萃之地，且民風極淳樸。傅氏子孫憑藉著這優美的環境，不但出了不少詩文書畫的名家，也頗有幾位是武技超群的。

傅祥畢生務農，其妻孫氏，生有四子。次子名綸，為聊城諸生（秀才），後配母氏，生三子，次子名諭，改營商業，因宅心寬厚，又重信義，而生意興隆，家計也漸充裕。諭配趙氏，生子三人，次子天榮，既長承襲父業、繼續經商，以奉養母兄。天榮配王氏，生有五子，次名思敬。思敬幼受經書，不久因家貧，棄學從商，是一位誠信、知足守分的商人。其妻李氏，素具賢

德，生有二子，長以恆，早卒；次以漸，字于磐，號星巖。自傳回祖至以漸，凡歷六世，一百六十年。在此期間，傅氏除耕讀外，多經營商業，不顯於世。但到傅以漸，以明季諸生，於清初大魁天下，不十年位登宰補，便大為振起傅氏的家聲。

傅以漸生於明萬曆三十七年（1609年），少時從大師受經講，明義理之學，被選為諸生。他為學極勤，因家貧缺少紙張，作文章時便在牆壁上起草，當文章寫成後再將字跡擦去，以備再用。夜間讀書，有時沒有燈火，便焚香為照明之具。有一次，土匪圍聊城，城垣幾被攻破，但他仍朗誦典籍，有如平時，認為「死生命耳！」他博通群書，尤留心於經世之學，從天文地理以至禮樂兵農之說，類皆考訂古今，討論原委，以求用世。清順治二年（1645年），清廷首次開科取士，當時以漸已三十五歲，他參加鄉試，得中舉人。次年，又赴北京會試，得中一甲一名進士，成為清代第一位狀元，大為鄉里增光。因此後來傅氏過年時所寫的春聯，常以「開代文章第一家」為下聯，以示炫耀。以漸中狀元後，歷任修撰、侍讀、庶吉士、國史院大學士等官。十五年，任會試總裁。並因久參機務，改任武英殿大學士兼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加少保，進階光祿大夫。這時的傅以漸已達到「榮祿兼極」的地步。以漸崛起孤寒，丕振家聲，受到傅氏後人普遍的尊敬。但他於明清易代之際，亟求功名，應科舉試，並在異族政府中為官。斯年先生本於民族大義，對他極表不滿。但傳說他並不甘心為異族效力，陰有非常之志。他以清聖祖的師傅之尊，臨終不肯請卹請諡，而清廷竟亦從其所願，與此事不無關係。

傅以漸與其妻虞氏僅有一子，名端揆，八歲而殤，由族子宅揆繼嗣。宅揆有一子，名永綽，為乾隆十七年（1752年）壬申舉人，為人耿亮廉潔，官至台州同知。永綽初娶何氏，早死。續娶楊氏，名秋輝，但無所出。再娶黃氏，生三子，長名廷輝，字映宸；次名廷椿，三名廷松。廷輝就是斯年先生的高祖。廷輝長大後，乃捐納了一個九品小官，分發河南任職，並曾參討天理教之變。廷椿事蹟無考，廷松是位豪俠人物。廷輝妻朱氏，生二子，長名繩勛，字接武，號秋屏，嘉慶十九年（1814年）進士，道光末年，歷任浙江、江西、江蘇巡撫等職。次子繼勛，字玉溪，號湘屏，為斯年先生的曾祖，道

光五年（1825年）拔貢，在安徽任知縣、知府二十餘年，所至有循聲。他爲人不恃不求，順時守分。任知縣時，專以慈祥化民，排難息訟，不假威嚇。百姓如有訟事，例不開庭，而予以誘導，勸其和解。時常訪問百姓，探求民隱，平反冤獄極多。他曾以格言四句，勉勵縣學諸生，且身體力行，以爲倡率。格言是：「貴莫過於爲聖賢，富莫過於蓄道德，貧莫過於不聞道，賤莫過於不知恥。」清代名臣如李鴻章、丁寶楨，都出自他的門下。道光末年，他曾以循良陞見。咸豐初年，洪楊亂起，安徽被兵禍，省城失陷。巡撫福濟以繼勛熟悉安徽情形，密保他爲布政使，兼辦全省糧臺，甚受倚重。但不久福濟調任，他以繼任者不聽進言，引疾而歸。

傅繩勛有八子，長子浚，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進士，曾任職吏部。次子沅，咸豐元年（1851年）舉人，曾任山西大寧等知縣。四子澐，出身廩貢，曾任直隸候補縣丞。七子濂，曾任軍職。其餘諸子均無可查考。

傅繩勛的元配李氏，生有七子。長子潛，同治元年（1862年）舉人，官至浙江嚴州知府。次子漣，曾任浙江候補布政使理問。三子淦，是斯年先生的祖父，事蹟詳見後。四子瀾，曾任江蘇武進典史。五子瘍，名亦佚。六子澁，曾被任命爲安徽候補府經歷。七子溥，性極聰慧，七歲而殤。

清代道咸同時代，是傅氏的盛時。繩勛、繼勛二人均爲封疆大吏，而諸子多具才華，或以詩文書畫名世，或以武技見稱，可謂滿門俊逸。但傅氏先人，大都孤高廉介，居官決不積蓄金錢，決不逢迎上官，以致解任後一貧如洗。有的甚至恃才傲物，玩世不恭。因此傅氏雖自清初即是海內名家，但歷代大都與窮神爲伍。斯年先生的爲人，也頗有一些祖風。

斯年先生的祖父淦，字笠泉，是一位文武兼資具有多方面才藝的人。斯年先生受他的影響最深，他可以說是斯年先生學問人格基礎的奠立者。笠泉少有才名，博通經史，工讀書畫，尤以書法知名；精醫理，尤擅針灸；此外並長於武技，但從不傳授子弟。他爲人澹泊自甘，不樂仕進。重諾任俠，雖貧不舉炊，而赴義惟恐後人。生平不爲人作墓誌，私函不入官府。他是同治十二年（1873年）拔貢，以後便不再參加科舉，絕意仕途。他少喜遨遊，塞北江南，到處都有他的蹤跡。他認爲歷代的弊政，皆由宦官啓之，因此痛恨

宦官。笠泉兄弟，原合住於祖宅，後因各房人口漸多，乃謀議析居。相府原有樓十二座，笠泉均推讓給兄弟，獨分馬廄一座。而他不事生產，又好周濟窮人，以是日益貧困。笠泉配陳氏，名梅，生有三子，長名旭安，字伯雋，號曉麓，是斯年先生的父親。次子鬲安，三子春安。曉麓中年去世，他的兩個弟弟也均早逝，因此家道益落。到斯年先生降生，祖父笠泉年逾知命，及斯年先生稍長，笠泉即居家以課孫為樂，不再出遊；民國十一年（1922年）六月二日卒，享年七十八歲。他曾註《易筋經》，去世前，連同其他文稿一齊焚燬，以是無著作傳世。

斯年先生曾對弟弟斯巖說：「祖父生前所教我兄弟的，盡是忠孝節義，從未灌輸絲毫不潔不正的思想。我兄弟得有今日，都是祖父所賜。」從這些話，可以看出祖父笠泉對斯年先生的影響之深。

斯年先生的父親曉麓，德配李夫人，聊城西南鄉賀家海人，出生於一個富有的家庭。她雖然識字不多，但賢孝知大體。她生有二子，斯年先生居長，次為斯巖，字孟博。曉麓為光緒二十年（1894年）順天舉人，性仁厚，有文名。曾任山東東平縣龍山書院山長六年，光緒三十年（1904年），病歿於任所，年三十九，父母均在堂。時斯年先生僅九歲，斯巖纔七個月，賴門生故舊，經紀其喪，由李夫人撫櫬歸聊。當曉麓病時，李夫人親往東平侍疾，割股和藥以進，但卒不能救。曉麓既歿，夫人守節，事翁姑，撫幼子，克勤克儉，倍嘗艱辛。親舊賻贈數千緡，由山友人周祖瀾、范玉波二人代存生息，維持家計。此外，曉麓的學生，也表現出難得的風義，每當舊曆年底以前，他們之中必有一人來聊城，送上大量的用品和食物，並在商號代為存上若干銀錢，以備來年之用。年年如此，直到斯年先生學成就業後纔停止。曉麓有一位學生侯延堃，少時孤貧，為商店學徒，但極好讀書，工作之暇，手不釋卷。曉麓見他是可造之才，於是助其進入龍山書院就讀。後來侯氏考取進士，而曉麓已歿，他便在墳前自誓，以撫育斯年先生兄弟為己任。後來斯年先生兄弟上學，都由他供給，親如家人。他年齡頗長，斯年先生兄弟都以父執事之。侯氏卒後，斯年先生曾說：「我家非侯公無以有今日！」

斯年先生的學問基礎，雖由祖父笠泉奠立，但太夫人督教之功，亦不可

沒。當時家境極困，日用全賴太夫人張羅。她含辛茹苦，盡力供給斯年先生兄弟讀書。同時管教極嚴，遇有過錯，立予責罰。斯年先生中年，遇太夫人發怒，仍長跪不起。此外，太夫人的膽識也有過人之處，民國十八年（1929年），聊城為土匪攻陷。匪徒至家中劫掠，太夫人與之爭論，匪徒舉槍擬之，太夫人神色不變，言談自若，匪徒終不敢加害。其後斯年先生著文，攻擊權要；其弟斯巖從軍，每戰身先士卒。他們的膽識和勇氣，都沒有辜負太夫人的培育。

民國二十年後，家境漸裕，太夫人雖然年逾六十，仍勤儉如昔，她時常告訴孫輩往日生活的艱苦，勸勉他們發憤為學，並不可亂用金錢。他她對貧困的親友，則十分溫恤，每遇他們有所需求，總是盡力相助。抗戰期間，太夫人隨斯年先生移居重慶，民國三十年（1941年）十月二十一日病逝，享年七十五歲。當太夫人病時，斯年先生正患重病，恨防護未週，痛傷不已。次年，他給友人的信上說：「不幸者家母於去年十月去世矣！如非在此亂世，或者不至於此，此弟念之不能忘者也。」可見斯年先生抱憾之深。<sup>①</sup>

## 二、斯年先生年譜

清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 一歲

農曆二月十三日辰時（陽曆三月二十六日），先生生於山東省聊城縣北門內祖宅。

清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 二歲

① 以上見傅樂成，《傅孟真先生年譜》（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68（1979）年5月再版），頁1-3。

又見《傅斯年全集》第七冊，附載二，傅樂成，《傅孟真先生年譜》（台北，聯經事業出版公司，民國69（1980）年初版），頁253-255。

另見傅樂成，〈傅孟真先生的先世〉（氏著《時代的追憶論文集》，台北，時報出版公司，民國73（1984）年3月初版，頁111-128）。

先生在聊城。

清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 三歲

在聊城。

清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 四歲

在聊城。

清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 五歲

在聊城。

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 六歲

春，入邑人孫達宸拔貢學塾，同學有朱笠升、鄭錫九等。祖父傳淦課讀於家。

清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 七歲

在學塾攻讀。祖父課讀於家。

清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 八歲

在學塾攻讀。祖父課讀於家。

清光緒三十年（1904年） 九歲

在學塾攻讀。祖父課讀於家。五月，父傳旭安卒，享年三十九歲。

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 十歲

春，入東昌府立小學堂讀書。祖父課讀於家。天賦秉異，有神童之稱。

清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 十一歲

在東昌府立小學堂攻讀。祖父課讀於家，是歲讀畢十三經。

清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 十二歲

在東昌府立小學堂攻讀。祖父課讀於家。

清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 十三歲

(一)在東昌府立小學堂攻讀。祖父課讀於家。

(二)冬，隨侯延堧（雪舫）進士至天津，住孔繁淦（祖父的門生）家，由父執吳樹棠（字筱洲）按時接濟。

毛子水云：「這個侯先生，為山東省東平縣人，是傅曉麓先生的學生；平日對他的老師很為尊敬。侯先生到北京會試，中了進士；回到家鄉，則



三十九歲的老師已因病過世了。他便把老師兩個兒子的撫養和教育當作他自己的責任。傅先生幼時文史的根柢，除他的祖父外，受到侯先生培養的益處很多。就是他生平樂於幫助故人的子弟，恐怕侯先生的榜樣亦不會沒有幾分影響。」<sup>②</sup>

**清宣統元年（1909年） 十四歲**

春，考入天津府立中學堂，開始接受新式教育。

**清宣統二年（1910年） 十五歲**

在天津府立中學堂攻讀。

**清宣統三年（1911年） 十六歲**

(一)在天津府立中學堂攻讀。

(二)臘月，與聊城縣紳丁理臣之長女馥萃女士結婚。

**中華民國元年（1912年） 十七歲**

在天津府立中學堂攻讀。

**中華民國二年（1913年） 十八歲**

夏，考入北京大學預科。

毛子水云：「民國二年，傅先生進了北京大學預科。那時的大學預科分甲乙兩部：甲部偏重數學及自然科學，乙部偏重文史。傅先生入乙部，雖身體羸弱，時常鬧病，但成績仍是全部的第一。就我現在所記到而言，當時全校學生中，似乎沒有比他天資更好的。」<sup>③</sup>

**中華民國三年（1914年） 十九歲**

在北京大學預科攻讀。

**中華民國四年（1915年） 二十歲**

在北京大學預科攻讀。

---

② 傅樂成，《傅孟真先生年譜》，頁3-5（以下簡稱《傅孟真先生年譜》）。

③ 以上見《傅孟真先生年譜》，頁6-8。

另參看岳玉璽、李泉、馬亮寬，《傅斯年——大氣磅礴的一代學人》，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3月第1版，頁1-21。

## 中華民國五年（1916年） 二十一歲

(一)夏，卒業於北京大學預科。

(二)秋，升入文本科國文門。

毛子水云：「他那時的志願，實在是要通當時所謂國學的全體；惟以語言文字為讀一切書的門徑，所以託身中國文學系。當時北京大學文史科學生讀書的風氣，受章太炎先生學說的影響很大。傅先生最初亦是崇信章氏的一人，終因資性卓犖，不久就衝出章氏的樊籠。」<sup>④</sup>

## 中華民國六年（1917年） 二十二歲

在北京大學文本科攻讀。

1.毛子水云：「傅先生進中國文學系一年後，胡適之先生來北京大學任教，胡先生於應用科學方法以研究學問以外，兼提倡白話文，亦被稱為新文學。當時在北京大學師生中，文言文寫得不通或不好而先贊成新文學的很多，文言文寫得很通很好而贊成新文學的很少。傅先生便是後一類中的一個，只有這一類人，才可以說真正能夠懂得用白話文的意義和道理。」

2.羅家倫云：「我和孟真是民國六年開始在北京大學認識的。他的中國學問的基礎很好，而且瀏覽英文的能力很強，這是一件研究中國學問的人不容易兼有的條件。我當時讀的是外國文學，我們開始有較深的了解，卻在胡適之先生家裡，這時期還是適之先生發表了〈改良文學芻議〉以後，而尚未正式以文學革命作號召以前。適之先生甚驚異孟真中國文學之博與精，和他一接受以科學方法整理舊學以後的創獲之多與深。適之先生常常是很謙虛的說：他初進北大做教授的時候，常常提心吊膽，加倍用功，因為他發現許多學生的學問比他強。這就是指傅孟真、毛子水、顧頡剛等二、三人說的。當時的真正國學大師如劉申叔（師培）、黃季剛（侃）、陳伯弢（漢章）幾位先生，都在北大文科任教也非常之讚賞孟真，抱著老儒傳經的觀念，想他繼承儀徵學統或是太炎學派等衣鉢。孟真有

---

④ 以上見《傅孟真先生年譜》，頁8。



徘徊歧路的資格，可是有革命性，有近代頭腦的孟眞，決不徘徊歧路，竟一躍而投身文學革命的陣營了。以後文學革命的旗幟，因得孟眞而大張。」羅氏又敘述先生當時之生活情形云：「孟眞住在校內西齋四號。他房間裏住了四個同學：一個顧頡剛靜心研究他的哲學和古史；一個狄君武專心研究他的詞章；一個周烈亞阿彌陀佛的在研究他的佛經；一個就是大氣磅礴的傅孟眞，和他的一班不速之客的朋友羅志希（編者按：羅氏字志希）等在高談文學革命和新文化運動。這一個甚麼配合！可是道並行而不相悖，大家還是好朋友。」<sup>⑤</sup>

中華民國七年（1918年） 二十三歲

(一)在北京大學文本科攻讀。

夏，約集同學羅家倫、毛準等二十人，創立新潮社。籌備發行《新潮》雜誌。

1.毛子水云：「我們現在試一翻讀《新潮發刊旨趣書》，便可以知道傅先生那時對於學術思想的抱負和見解了。下面幾節的意旨，到現在還值得注意：『群衆對於學術無愛好心，其結果不特學術銷沉而已，墮落民德爲尤巨。不曾研詣學問之人，恆昧於因果之關係，審理不瞭而後有苟且之行。又，學術者，深入其中，自能率意而行，不爲情牽。對於學術負責任，則外物不足縈惑；以學業所得爲辛勞疾苦莫大之酬，則一切犧牲儘可得精神上之酬償。試觀吾國宋明之季，甚多獨行之士，……彼能於真理眞知灼見，故不爲社會所征服；又以有學業鼓舞其氣，故能稱心而行，一往不返。中國群德墮落，苟且之行偏於國中。尋其由來，一則原於因果觀念不明，不辨何者可爲何者不可爲；二則原於缺乏培植『不破性質』之動力，國人不覺何者爲『稱心爲好』。此二者又皆本於群衆對於學術無愛好心。……觀察實情，乃覺今日最危險者，無過於青年學生。邇者惡人模型，思想厲鬼偏於國中，有心人深以爲憂。……本誌發願協助中等學校之同學，力求精神上脫離此類感化。於修學立身之方法與途徑，盡

⑤ 以上見《傅孟眞先生年譜》頁9-11。

力研求，喻之於衆。……」這兩段裡邊所指出的弊病，到現在還更厲害起來。」

2.羅家倫云：「民國七年孟真和我，還有好幾位同學，抱著一股熱忱，要爲文學革命而奮鬥。於是繼《新青年》而起，組織『新潮社』，編印《新潮》月刊。這是在這個時代中公開主張文學革命的第二個刊物。我們不但主張而且實行澈底的以現代人的語言，來表達現代人的思想，所以全部用語體文而不登載文言文。（《新潮》的發刊詞卻是例外，這是孟真別有作用的做法。）我們主張文學的任務，是人生的表現與批評，應當著重從這個方面去使文學美化和深切化，所以我們力持要發揚人的文學，而反對非人的與反人性的文學。我們主張學術思想的解放，打開以往傳統的束縛，用科學的方法來整理國故。我們推廣這種主張到傳統的社會制度方面，面對固有家族制度和社會習慣加以批評。我們甚至於主張當時駭人聽聞的婦女解放。《新潮》的政治彩色不濃，可是我們堅決的主張民主，反封建，反侵略；我們主張我們民族的獨立和自決。總而言之，我們深信時至今日，我們應當重定價值標準，在人的本位上，以科學的方法和哲學的態度，來把我們固有的文化，分別的重新估價。在三十年前的中國，這一切的一切，是何等的離經叛道，驚世駭俗。我們主張的輪廓，大致與《新青年》主張的範圍，相差無幾。不過當時的一般人看來，鬍鬚《新潮》的來勢更猛一點，引起青年們的同情更多一點。《新潮》的第一卷第一期，複印到三版，銷到一萬三千冊，以後也常在一萬五千冊左右，則聲勢不可謂不浩大。

（二）是歲先生於《新青年》等刊物發表之文字，計有：1.文學革命新申義 2.文言合一草議 3.戲劇改良各面觀 4.再論戲劇改良 5.中國歷史分期之研究 6.中國學術思想之基本誤謬等篇。（均收入《傅斯年全集》第四冊，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民國69年9月初版）<sup>⑥</sup>

1.斯年先生在《新青年》第四卷第四號發表的〈中國學術思想界之基本

<sup>⑥</sup> 以上見《傅孟真先生年譜》頁11-14。

誤謬》一文，縷述中國傳統學術思想有下列幾點缺失，其要旨爲：

一、中國學術，以學術爲單位者至少，以人爲單位者轉多，前者謂之科學，後者謂之家學；家學者，所以學人，非所以學學也。二、中國學人，不認個性之存在，而以爲人奴隸爲其神聖之天職。每當辯論之會，輒引前代名家之言，以自矜重，以駭庸衆，初不顧事理相違，言不相涉。三、中國學人，不認時間之存在，不察形勢之轉移。每立一說，必謂行於百世，通於古今。導人浮淺，貽害無窮也。四、中國學人，每不解計學上分工原理（Division of labour），殊類學術，皆一群之中，所不可少，交相爲用，不容相非。自中國多數學人眼光中觀之，惟有己之所肄，卓爾高標，自餘藝學，舉無足采。……造成褊淺之量，不容殊己，賤視異學。莊子謂之「各思以其道易天下。」究之，天下終不可易，而學術從此支離。其才氣大者，不知生有涯而知無涯，以爲學天下之學術，皆吾分內所應知；所學之範圍愈廣，所肄之程度愈薄，求與日月合其明，其結果乃不能與燭火爭光。清代學者，每有此妄作。凡此兩者，一褊狹而一龐大，要皆歸於無當；不知分工之理，誤之誠不淺也。五、中國學人，好談致用，其結果乃至一無所用。學術之用，非必施於有政，然後謂之用，凡所以博物廣聞，利用成器，啓迪智慧，鎔陶德性，學術之眞用存焉。中國學人，每以此類之大用爲無用，而別求其用於政治之中。六、凡治學術，必有用以爲學之器；學之得失，惟器之良劣足賴。西洋近世學術，發展至今日地步者，誠以邏輯家言，詣精致遠，學術思想界爲其率導，乃不流於左道也。名家之學，中土絕少，魏晉以後，全無言者；即當晚周之世，名家當塗，造詣所及，遠不能比德於大秦，更無論於近世歐洲。中國學術思想界之沈淪，此其一大原因。七、吾又見中國學術思想界中，實有一種無形而有形之空洞間架，到處應用。……此病所中，重形式而不管精神，有排場不顧實在；中國人所想所行，皆此類矣。先生于文末明白指出：「今日修明中國學術之急務，非收容西洋思想界之精神乎？……欲收容西洋學術思想以爲我用，宜先去此基本誤謬，然後有以不相

左耳。」<sup>⑦</sup> 這種大膽的言論，可以說是「發前人之所未發」，也可以說是先生在積久的研習中國舊學後的猛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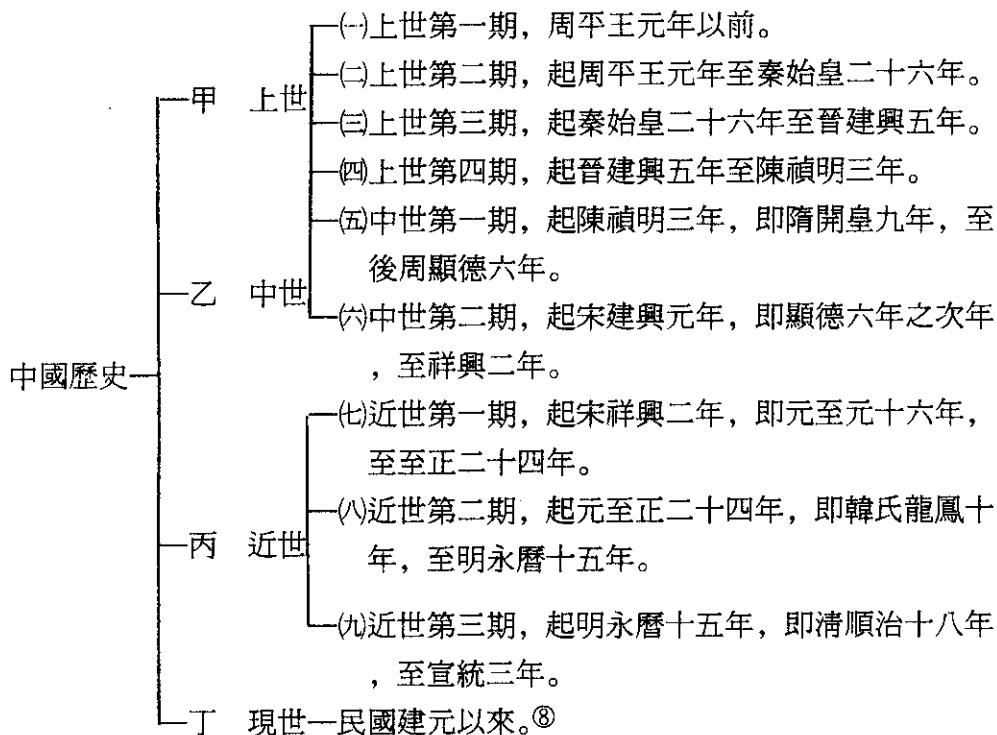
2. 先生在《北京大學日刊》發表的〈中國歷史分期之研究〉一文的主要內容為：凡研治「依據時間以為變遷」之學科，無不分期別世，以御紛繁，地質史有「世紀」「期」「代」之判，人類進化史有「石世」「銅世」「鐵世」「電世」之殊，若此類者，皆執一事以為標準，為之判別年代，一則察其遞變之迹，然後得其概括；一則振其綱領之具，然後便於學者。通常所謂歷史者，不限一端，而以政治變遷，社會遞嬗為主體。

西洋歷史之分期，所謂「上世」「中世」「近世」者，與夫三世之中，所謂枝分（Subdivisions）在今日已為定論。雖史家著書，小有出入，大體固無殊也。返觀中國，論時會之轉移，但以朝代為言。不知朝代與世朝，雖不可謂全無關涉，終不可以一物視之。……後之為史學者，僅知朝代之辯，不解時期之殊，一姓之變遷誠不足據為分期之準也。日本桑原隲藏氏著《東洋史要》（後改名《支那史要》），始取西洋上古中古近古之說以分中國歷史為四期。近年出版歷史教科書，概以桑原氏為準，未見有變更其綱者。尋桑原氏所謂四期，一曰上古，斷至秦皇一統，稱之為漢族締造時代。二曰中古，自秦皇一統至唐亡，稱之為漢族極盛時代。三曰近古，自五季至明亡，稱之為漢族漸衰，蒙古族代興時代。四曰近世，括滿清一代為言，稱之為歐人東漸時代。……今桑原氏之分期法，始以漢族升降為別，後又以東西交通為判，所據以為分本者，不能上下一貫，其弊一也。

……漢代之中國與唐代之中國，萬不可謂同出一族。今桑原氏泯其代謝之跡，強合一致，名曰「漢族極盛時代」，是為巨謬（說詳次節）。其弊二也。凡此二弊，不容不矯。本篇所定之分期法，即自矯正現世普行桑原之分期法始。以愚推測所及者言之，欲重分中國歷史之期世，不可不注意下列四事。一、宜知中國所謂漢族於陳隋之間大起變化。二、宜知

<sup>⑦</sup> 《傅斯年全集》第四冊，頁166-175。

唐宋兩代有漢胡消長之跡南宋之亡又爲中國歷史一大關鍵。三、宜據中國種族之變遷升降爲分期之標準。四、宜別作「枝分」(Subdivision)勿使與初分相混。如上所言既以漢族之變化與升降爲上世中世近世分期之標準，而每世之中，爲年甚長，政俗大有改易，不可不別作「枝分」，使之綱目畢張。茲以政治變遷爲上世枝分之分本，風俗改易爲中世枝分之分本，種族代替爲近世枝分之分本，合初分與枝分，圖爲下表，而說明之。



中華民國八年(1919年) 二十四歲

(一)一月一日，先生主編之《新潮》月刊出版。

⑧ 《傅斯年全集》第四冊，頁176-183。

(二)五月，五四運動發生，先生為參與此次運動之北京大學學生代表之一。

1.毛子水云：「《新潮》一卷五號出來後，「五四運動」便發生了。傅先生在當時北京大學學生中，無疑的是新思想運動的領袖。但「五四運動」那樣的發展和結果，以及後來影響，則或許不是傅先生所預期所願望的。」

2.程滄波云：「論到「五四」時代的人物，陳獨秀、胡適之與傅孟真，見解智慧，陳、傅都超過了胡，可是胡對他們有相當的化導作用。這因在當時，胡的基本西洋學識比他們倆人深入。孟真對胡，生平執禮甚恭，但他們不是師弟。世間所說傅是胡的大弟子，這是錯誤的，如果論思想見解，若說傅是弟子，那是青出於藍了。」又云：「五四時代的人物，多半是自由主義中心的人物。自由主義中的尊重個人，發揮個人人格，注意人性，充滿正義觀念，這是中國文化傳統與西洋基督文明所共有的特點。孟真的家世，是純粹士大夫家庭。他在進大學以前，中國經史已極有根底，而且對中國的學術源流，也有明確的認識。……一位中國文學系的學生，一變而成一個時代文化思想的領導者，這可以窺見孟真的精神軀殼之偉大，他的智慧吸引能力的尖銳。」

(三)夏，卒業於北京大學文科國文門。<sup>⑨</sup>

(四)秋，以出類拔萃的成績，考取山東省官費留學。

(五)冬，赴英國留學。

先生在坐船前往英國途中所寫的文章草稿裡說：「在北京起身的那一天，十二月二十六日，天陰的很……我這次往歐洲去奢望甚多，一句話說，澄清思想中的糾纏，鍊成一個可以自己信賴過的我」。他說：「青年以外的中國人是靠不住的，但請問中國的青年又是怎麼樣？」他認為改造社會是中國當前要務，而改造社會必先改造自己。<sup>⑩</sup>

⑨ 以上見《傅孟真先生年譜》，頁15-18。

⑩ 此一條見王汎森·杜正勝編，《傅斯年文物資料選輯》，台北，傅斯年先生百齡紀念籌備會出版，民國84（1995）年12月16日初版，頁35。



(六)是歲先生在《新潮》所發表之文字，計有：

1.中國文學史分期之研究 2.怎樣做白話文 3.中國文藝界之病根 4.漢語改用拼音文字的初步談 5.譯書感言 6.白話文學與心理的改革 7.人生問題發端 8.對於中國今日談哲學之感念 9.毛子水「國故和科學的精神」識語 10.新潮發刊旨趣書 11.隨感錄 12.新潮之回顧與前瞻 13.故書新評 14.清代學問的門徑書幾種 15.宋朱熹的詩經集傳和詩序辯 16.清梁玉繩著史記志疑 17.馬敘倫著莊子札記 18.宋郭茂倩著樂府詩集 19.王國維著宋元戲曲史 20.失勒博士的形式邏輯 21.英國耶芳斯之科學原理 22.萬惡之原 23.去兵 24.心氣薄弱之中國人 25.自知與終身之事業 26.社會一群衆 27.社會的信條 28.破壞 29.朝鮮獨立運動中的新教訓 30.一般瘋話 31.答時事新報記者 32.致同社同學讀者 33.答誠吾 34.答余裴山 35.答史志元 36.因明答諍 37.對於新潮一部分的意見 38.深秋永定門城上晚景 39.老頭子和小孩子 40.前倨後恭 41.咱們一伙兒 42.心悸 43.心不悸了等篇。(均收入《傅斯年全集》第四、五、七冊中)<sup>①</sup>

這一年，先生在《新潮》第一卷第一號發表的〈人生問題發端〉一文之主旨是：人生問題是個大題目！是個再大沒有的題目！照我現在的學問思想而論，決不敢貿貿然解決他。但是這個問題，卻不能放在將來解決；因為若不曾解決了他，一切思想，一切行事，都覺得沒有著落似的。所以不瞞鄙陋，勉強把我近來所見，寫了出來，作為我的人生觀。還要請看的人共同理會這個意思，大家討論，求出個確切精密的結束；我這篇文章，不過算一種提議罷了。所以題目就叫做人生問題發端。

……拿人生解釋人生，是現在思想潮流的趨勢。我們在這裡研究人生問題，當然不能離開這條道路啊！

……達生觀、出世觀、物質主義、遺傳的倫理觀念，這四種都是在中國流行的「左道」人生觀念。「因為他們都不是拿人生解釋人生問題，都是

<sup>①</sup> 以上見《傅孟真先生年譜》，頁18-19。

拿『非人生』破壞人生，都是拿個人的幻想，或一時壓迫出來的變態，誤當做人生究竟」。……只要把「就人生論人生」一條道理當做標準不難斷定他的是非了。我對於人生，不能沒有一番見解；這見解現在卻切切實實相信得過，……人生觀念應當是：為公衆的福利自由發展個人（The free development of the individuals for the Common Welfare）。

怎樣叫做自由發展個人？就是充量發揮己身潛蓄的能力，卻不遵照固定的線路。怎樣叫做公衆的福利？就是大家皆有的一份，而且是公共求得的福利。為什麼要為公衆的福利？就是因為個人的思想行動，沒有一件不受社會的影響，並且社會是永遠不消滅的。怎樣能實行了這個人生觀念？就是努力。姑且拋開理論，把偽《列子·湯問篇》裡一段寓言，取來形容這道理吧（原文略－編者）。這段小說把努力為公、兩層意思，形容得極明白了。「子子孫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為乎？」一句話，尤甚好。我們可以從這裡透徹的悟到，人類的文化和福利，是一層一層堆積來的，群眾是不滅的，不滅的群眾力量，可以戰勝一切自然界的。末一節話雖荒唐，意思乃是說明努力的報酬。但群眾能永遠努力做去，沒有不「事竟成」的。我們想像人生，總應當遵從愚公的精神。我的人生觀念就是「愚公移山論」。簡截說罷，人類的進化，恰合了愚公的辦法。人類所以能據有現在的文化和福利，都因為從古以來的人類，不知不覺的慢慢移山上的石頭土塊；人類不滅，因而漸漸平下去了。然則愚公的移山論，竟是合於人生的真義，斷斷乎無可疑了。<sup>⑫</sup>

中華民國九年（1920年） 二十五歲

（一）夏，入倫敦大學研究實驗心理及生理，兼治數學。

羅家倫云：「……他從史培曼（Spearman）教授研究實驗心理學，這看去像是一件好奇怪的事。要明白他這個舉動，就得要明白當新文化運動時代那般人的學術的心理背景。那時候大家對自然科學，非常傾倒；除了想從自然科學裡面得到所謂可靠的知識而外，而且想從那裡得到科學

⑫ 《傅斯年全集》第四冊，頁186－201。

方法的訓練。認為這種訓練在某種學科以內固然可以應用，就是換了方向而來治另外一套學問，也還可以應用。這是孟真要治實驗心理學的原因。孟真爲了要治實驗心理學，進而治物理、化學和高深的數學。他對於數學的興趣比較濃，因為他在國內的時候就喜歡看邏輯的書，研究皮爾生的「科學規律」(Karl Pearson 的 "Grammar of Science") 和或然律 (Law of Probability) 後來像金斯 (T. M. Keynes) 所著的「或然率研究」("Treatise on Probability") 一類的書，都是他很欣賞的。所以可以說，孟真深通科學方法論。當然以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的傅孟真，他的興趣決不會限於一方面。他對英國的哲學、歷史、政治、文學的書籍，不但能看，而且能體會。我想他對於蕭伯納的戲劇，幾乎每本都看過，所以蕭伯納死後，他有做文章批評的資格，而且批評的很深刻。(可是孟真所了解的易卜生主義，最初還是蕭介紹的)⑬

(二)是歲八月，先生從英國給胡適的信中談到他在倫敦大學的情形，說「近中溫習化學、物理學、數學，興味很濃，回想大學時六年，一誤于預科乙部，再誤于文科國文門，言之可嘆。」並記「下學年所習科目半在理科，半在醫科……我想若不于自然或社會科學有一、二種知道個大略，有些小根基，先去學哲學定無著落。」

(三)到英國的第一年，先生幫助英國文學家威爾斯 (H. G. Wells) 撰寫《世界通史》(The Outline of History) 中有關中國中古史的部份。該書於一九二〇年出版後，洛陽紙貴，十二年內銷售了一百五十萬本。⑭

(四)是歲先生在《新潮》發表之文字，計有：1. 寄同社諸兄 2. 陰曆九月十五日夜登東昌城 3. 自然等篇。(均收入《傅斯年全集》第七冊)⑮

中華民國十年 (1921 年) 二十六歲

在倫敦大學研究。

⑬ 《傅孟真先生年譜》，頁 20 - 21。

⑭ 《傅斯年文物資料選輯》，頁 37 - 38。

⑮ 《傅孟真先生年譜》，頁 21。

## 中華民國十一年（1922年） 二十七歲

(一)在倫敦大學研究。

(二)六月，祖父傅淦卒，享年七十八歲。<sup>①⑥</sup>

(三)先生在留學英國的後期對心理學相當失望。他認為對動物行為的研究不能運用到人身上，即使對他原來最感興趣的集體心理學也失去信心，不過他仍繼續注意收集心理學書籍。<sup>①⑦</sup>

## 中華民國十二年（1923年） 二十八歲

秋，由英至德，入柏林大學哲學院研究。

1.毛子水云：「他從英赴德進柏林大學；聽講的餘暇，最初專研讀馬黑（Ernst Mach）的著作，於感覺的分析（Analyse der Empfindungen）和力學（Mechanik）二書尤為用心。」

2.羅家倫云：「以後到了德國，因為一方面受柏林大學裏當時兩種學術空氣的影響（一種是近代物理學如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相對論、普朗克（Max Planck）的量子論，都是震動一時的學說；一種是德國歷來以此著名的語言文字比較考據學。）一方受在柏林的朋友們如陳寅恪、俞大維各位的影響，所以他在柏林大學既聽相對論，又聽比較語言學。他有了許多科學的方法和理論，又回頭發現了他自己曾經儲藏下的很豐富的中國歷史語文的知識，在此中可以另闢天地。所以他不但配談科學，而且是具備了一般科學理解的通才，並且更配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的所長了。這是孟真忽而研究中國文學，忽而研究實驗心理學，忽而研究物理數學，忽而又成為歷史語言學的權威的過程。還有一種這群人的學術的心理的背景，若是明白了，可以幫助了解當時那種旁徵側擊，以求先博後專的風氣。因為當時大家除了有很強的求知慾而外，還有想在學術裡求創獲的野心。不甘坐享現成，要想在浩瀚的學海之中，另有會心，『成一家之言』。這種主張裡，不無天真幼稚的成分，可是其勇氣雄心亦

<sup>①⑥</sup> 《傅孟真先生年譜》，頁21。

<sup>①⑦</sup> 《傅斯年文物資料選輯》，頁42。

不無可嘉之處。】<sup>⑮</sup>

中華民國十三年（1924年） 二十九歲

(一)在柏林大學研究。

(二)二月，祖母陳太夫人在家鄉去世，享年八十歲。

中華民國十四年（1925年） 三十歲

繼續在柏林大學研究，並經常與陳寅恪、俞大維等人研討學術問題，還先後會見了老同學毛子水、羅家倫、朱家驊、段錫朋等。<sup>⑯</sup>

中華民國十五年（1926年） 三十一歲

(一)在柏林大學研究。

(二)先生在柏林大學的數學筆記，其中有不少關於統計及或然率。他對統計及或然率極感興趣。曾自言「統計的觀點，尤可節約我的文人習氣，少排蕩於兩極端。」又說或然率的觀念「在近代物理學尤表顯威力，幾將決定論取而代之。這個觀念，在一般思想上有極要的施用。」

(三)先生在柏林大學的後期，讀了不少比較語言學方面的書，對梵文、藏文、緬甸文等皆下過一番功夫。在他的藏書中有一本于一九二五至一九二六年修習藏文的筆記，任課老師為 Herman Franke，當時係柏林大學額外教授。陳寅恪亦從他修習藏文。他的梵文文法課的老師 Tüders 是梵文泰斗，也是陳寅恪的老師。<sup>⑰</sup>

(四)九月，胡適到法國考察，傅先生特從德國到法國和他會晤，兩個人同吃同住，白天去巴黎法國圖書館看敦煌的卷子，晚上討論社會學術問題。

⑮ 《傅孟真先生年譜》，頁 21 - 22。另見芮逸夫，〈傅校長斯年先生年表〉（《傅故校長哀輓錄》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民國 40 年（1951 年）6 月初版，頁 5。）

⑯ 《傅孟真先生年譜》，頁 22。

《傅斯年——大氣磅礴的一代學人》，頁 347。

另參見馬亮寬、江心力，〈傅斯年生平簡譜〉（聊城師範學院歷史系等合編，《傅斯年》，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1 年，頁 347。

⑰ 《傅孟真先生年譜》，頁 22。《傅斯年文物資料選輯》，頁 50 - 53。

傅先生提出：中國一切文學都是從民間來的。從民間起來的時候是「生」，然後像人的一生一樣，由壯年而老年而死亡，胡適自稱：「這個觀念影響我個人很大。」

(五)冬，由德歸國，返里省親。

(六)十二月，接受廣州中山大學朱家驊邀請，攜弟斯巖（孟博）去中山大學任教。<sup>①</sup>

## 中華民國十六年（1927年） 三十二歲

(一)春，任廣州中山大學教授，兼文學院長及國文、歷史兩學系主任，並為學生開設了《尚書》、《古代文學史》、《陶淵明詩》和《心理學》等課程。

(二)秋，創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同時創辦週刊，招研究生。同年十一月一日，在週刊第一集第一期的發刊詞裡，揭示了研究的方針：「我們要實地搜羅材料，到民衆中尋方言，到古文化的遺址去發掘，到各種的人間社會去采風問俗，建設許多的新學問。」

(三)是歲先生在《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週刊》所發表之文字，計有：

1. 評秦漢統一之由來和戰國人對於世界之想像
2. 論孔子學說所以適應於秦漢以來的社會的緣故。
3. 評〈春秋時的孔子和漢代的孔子〉
4. 評丁文江的〈歷史人物與地理的關繫〉等篇（均收入《傅斯年全集》第三冊）。<sup>②</sup>

## 中華民國十七年（1928年） 三十三歲

(一)春，任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籌備委員。

(二)夏，中央研究院成立。是年底，先生應聘任歷史語言研究所長，所址設於廣州。

<sup>①</sup> 《傅斯年——大氣磅礴的一代學人》，頁367。

《傅孟真先生年譜》，頁23。

<sup>②</sup> 《傅孟真先生年譜》，頁23-24。

《傅斯年——大氣磅礴的一代學人》，頁367。



1. 朱家驊云：「十七年夏中央研究院成立，他於是年底應聘任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所務以外，並襄助蔡子民先生籌劃院務。院內一切制度的確立，和各種方案的訂定，他貢獻了不少的意見。後來中央研究院的發展擴充，他有很大的功勞。」

2. 董作賓云：「爲甚麼要辦歷史語言研究所？這答案見於傅孟真先生親手所寫的民國十七年度報告書：『中央研究院設置之意義，本爲發達近代科學，非爲提倡所謂固有學術。故如以歷史語言之學承固有之遺訓，不欲新其工具，益其觀念，以成與各自然科學同列之事業，即不應於中央研究院中設置歷史語言研究所，使之與天文、地質、物理、化學等同倫。今者決意設置，正以自然科學看待歷史語言之學。』這是孟真先生獨具隻眼的看法，很明白的要在中國建設起來歷史學和語言學兩種科學；這也是他留學歸國之後，對於國家一個偉大的貢獻，以至於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怎樣去辦這個研究所，他在報告中也寫得明白：『此雖舊域，其命維新。材料與時增加，工具與時擴充，觀點與時推進，近代在歐洲之歷史語言學，其受自然科學之刺激與補助，昭然若揭。以我國此項材料之富，歐洲人爲之羨慕無似者，果能改從新路，將來發展，正未有艾。故當確定旨趣，以爲祈嚮，以爲工作之徑，以吸引同好之人。此項旨趣，約而言之，即擴充材料，擴充工具，以工具之施用，成材料之整理，乃得問題之解決；並因問題之解決，引出新問題，更要求材料與工具之擴充；如是伸張，乃向科學成就之路。』他這種見解真使得當時的一般腐儒咋舌。他不贊成整理『國故』，研究『國學』或『中國學』等字樣，用老法子囫圇吞棗讀古書。他主張的是要能從中國採集的原料裏面，製造成歷史語言科學來，並且特別強調要用新的工具，新的材料，研究新的問題。」又云：「在民國十七年報告中，他曾擬定了要舉辦的是：甲、助成從事純粹客觀史學及語言之企業。乙、輔助能從事且已從事純粹客觀史學及語學之人。丙、擇應舉之合衆工作次第舉行之。丁、成就若干能使用近代西洋人所使用之工具之少年學者。戊、使本所爲國外治此兩類科學者公有之刊布機關。己、發達歷史語言兩科之目錄及文籍檢字學。同

年在廣州出版的集刊第一本第一分用籌備處名義發表的『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有長達七千字的論述。首先敘述歷史學和語言學，在歐洲都是很近才發達的，而在中國則發達最早。推崇顧炎武、閻若璩能用最近代的方法對付歷史學語言學，而抨擊章炳麟的文始倒退了三步，新方言倒退了兩千多年。他指出三個標準：(一)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進步；凡間接的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創造之系統，而不繁豐細密的參照所包含的事實，便退步。(二)凡一種學問能擴張他所研究的材料便進步，不能便退步。(三)凡一種學問能擴充他所研究時應用的工具的，則進步；不能的，退步。他曾逐一加以發揮，但仍不外乎『新問題，新材料，新方法』的一貫主張。其中的名句：『總而言之，我們不是讀書的人，我們只是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我們只是要把材料整理好，則事實自然顯明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貨，十分材料出十分貨，沒有材料便不出貨。』最後又揭櫫三個口號：『一、把些傳統的或自造的仁義禮智或其他主觀同歷史學和語言學混在一氣的人，絕對不是我們的同志！二、要把歷史學語言學建設得和生物學地質學等同樣，乃是我們的同志！三、我們要科學的東方學之正統在中國！』像這類口快心直，才氣橫溢，要說甚麼就說甚麼，除非孟真先生，寫不出來這樣生龍活虎般的文章。」

3. 勞幹云：「民國十七年十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一分，刊載著『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這是這一年五月孟真先生寫成的。這篇裡面的內容決定了以後的時期史學研究應當走的路線，至今日還沒有甚麼重大的修改。自然，我們還有很多未曾做到的地方，但這個提示的價值是不容忽略的。孟真先生這篇論文之中，首先揭明了我們做歷史的人所做的工作，並不是一個如何『經天緯地』的工作，而且這個工作之中，也絕對不容許任何的主觀偏見存在。歷史學換句話說就是史料處置學，他是經驗科學的一支，和生物學地質學屬於經驗科學完全一樣。我們在中國做歷史研究的人們有時是要整理國故的，但其中卻並不是有好惡的偏見，而是為的材料的方便，和在中國做生物學研究或地質學研究的人們，要偏重在中國地上和地下的生物學材料或地質學材

料一樣。關於歷史學發展的標準，孟眞先生有一個概括的敘述。第一：必需能發現新問題。對於歷史材料的處理，要能夠直接對材料的本身，重新批判去找新的問題，不當以昔人處理的舊公式爲滿足，而陳陳相因的下去。然後歷史的研究才能有新的發展。第二、必需擴張使用歷史材料範圍。這些材料的範圍，就性質方面來說，應當擴張到史籍材料以外的材料；就地域方面來說，應當擴張到漢語文化以外的材料。就前者來說，例如地下材料的彝器，甲骨，簡牘，明器，偶然發現的敦煌卷子，平時不被人注意的檔案，以及從人類學調查得來的資料。就後者來說，便是在一般中國文獻中比較忽略的，即是屬於匈奴、鮮卑、突厥、回紇、契丹、蒙古、女眞等族的文獻和其他資料。第三：必需擴張研究工具。凡是任何科學的發展，都需要研究的人具有和這個科學相關的知識，作爲工具。現代歷史學研究，已經成了一個各種科學的方法匯集，地質、地理、考古、生物、氣象、天文等學，無一不是供給研究歷史問題者之工具。因此凡是做歷史研究的人，對於語言學，文字語言工具和一般自然科學知識都是被認爲必需的。——以上只是將孟眞先生的意見，作爲大致的概括，如與原文的意思有出入時，請參考本文。誠然自清末以來，前輩的人對於歷史學研究的意見和示範的工作，不是毫無一點貢獻，只是都比較零碎，而影響比較上也不算最大。只有胡適之先生的北京大學《國學季刊》發刊詞，和傅孟眞先生〈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的旨趣〉，兩篇文字可以說是近年來中國歷史研究經過上的重要文獻，而奠定了中國現代歷史學的基礎。」

4. 李濟云：「以歷史研究所爲大本營在中國建築『科學的東方學正統』，這一號召是具有高度的鼓舞性的；舉起這面大旗領首向前進的第一人，是年富力強的傅斯年。那時他的年齡，恰過三十不久，意氣豐盛，精神飽滿，渾身都是活力；不但具有雄厚的國學根底，對於歐洲近代發展的歷史學、語言學、心理學、哲學以及科學史都有澈底的認識。他是這一運動理想的領導人，他喚醒了中國學者最高的民族意識，在很短的時間內聚集了不少能運用現代學術工具的中年及少年學者。」

(三)是歲歷史語言研究所開始河南安陽殷墟之發掘，其後直至二十六年之十年間，凡發掘十五次，先後由董作賓、李濟主持其事，發現大量殷代銅器及甲骨文。此類銅器甲骨，經董李二氏及其他學者之研究，遂使商代史事，由隱晦而日趨顯明，中國之信史，因之向前推進數百年。

勞幹云：「孟真先生治學的範圍，相當廣博。他熟讀成誦的經籍相當的多，所以容易左右逢源。但他得益最深的還是四年在德國受到的教育，接受了德國的正統歷史學方法。他對於中國歷史上古部份，了解甚深，但他深知上古部分難以實證的太多，所以他並不鼓勵別人治上古史。他盡量的採用考古方法，希望以考古的成績作為治史的基礎。安陽發掘這一件事，他的推動可以說是一個決定的力量。」

(四)是歲先生在中山大學所編寫之講義，以及在《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週刊》與《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發表之論著，計有：

1. 中國古代文學史講義，2. 詩經講義稿（以上收入《傅斯年全集》第一冊）。3. 戰國子家敍論（收入同上書第二冊）。4. 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5. 與顧頡剛論古史書（以上收入同上書第四冊）。6. 周頌說等篇（收入同上書第三冊）。<sup>②</sup>

先生從十七年起，寫了一系列對中國上古史研究影響極大的文章。《戰國子家敍論》就是其中之一，其綱目為：

一、論哲學乃語言之副產品；西洋哲學即印度日耳曼語言之副產品；漢語實非哲學的語言；戰國諸子亦非哲學家 二、論戰國諸子除墨子外皆出于職業 三、論止有儒墨為有組織之宗派，其餘雖多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者，然大體是自成一家之言 四、論春秋戰國之際為什麼諸家並興 五、論儒為諸子之前驅，亦為諸子之後殿 六、論戰國諸子之地方性 七、論墨家之反儒學 八、老子五千言之作者及宗旨 九、齊晉兩派政論 十、梁朝與稷下 十一、獨行之士（存目） 十二、堅白異同之辯（存目） 以上兩章非倉卒所能寫就，待後補之 十三、禮祥之重興與五行

<sup>②</sup> 以上見《傅孟真先生年譜》，頁24-30。

說之盛 十四、所謂「雜家」 十五、預述周漢子家啣接之義<sup>②</sup>。

## 中華民國十八年（1929年） 三十四歲

(一)春，以歷史語言研究所專任研究員兼任所長，遷研究所至北平，所址在北海靜心齋。秋，兼任北京大學教授。

(二)九月，為購買明清大庫檔案多方商洽。明清大庫檔案是研究明清歷史的最珍貴的第一手資料，而歷史博物館卻當作「爛字紙」處理，後被李盛鐸輾轉買到但打算再賣出。先生與胡適、陳寅恪商議後決定買下，於是急電蔡元培籌款購買，並委任精通滿蒙文的陳寅恪整理研究。經陳寅恪和李宗侗居間連繫，以兩萬元買下。該檔案的搶救和整理使明清史研究有了突破性發展，亦是當時史學界的一件大事。<sup>③</sup>

(三)十一月，赴開封，解決中央研究院與河南民族博物館間之殷墟考古發掘糾紛。十二月，事畢返京。石璋如云：「這一次是去解決糾紛的。因為河南民族博物館與中央研究院發生一點小的誤會，以致發掘工作中斷。李濟之、董彥堂兩位先生於十八年十月二十二日由安返平，孟真所長即於二十四日進京報告院方，復於十一月二十一日動身赴汴，二十四日到達，下榻於河南大學（那時稱河南中山大學）。白天向各方接洽，夜裏在大禮堂作學術演講，上自天文，下至地質、科學、哲學、文學、史學等，無不涉及。談詞鋒利，好像長江黃河滔滔不絕，學問的淵博，深為員生所欽佩。尤其於考古學，古生物學，更為精詳的發揮，一講兩三個鐘頭毫無倦容，並且讓大家提出問題，當場給以解答。雖然大雪盈尺，而來聽講的人則大禮堂上幾乎不能容納。作者是當時的聽講者之一，就在那個時候對考古發生了興趣。適值省防吃緊，交通斷絕，在汴停留了一個多月，因此聽到了他多次的講演。直到十二月二十八日，雙方才告圓滿

<sup>②</sup> 《傅斯年全集》第二冊，頁85-157。

<sup>③</sup> 《傅斯年——大氣磅礴的一代學人》，頁367。

《傅斯年文物資料選輯》，頁73。

解決。他回到北平本所後，發表本所發掘安陽的經過。」<sup>⑥</sup>

**中華民國十九年（1930年） 三十五歲**

(一)主持史語所（歷史語言研究所的簡稱，以下同。）務，兼在北大教課。

(二)史語所調查廣東少數民族語言、河北方言。

(三)十一月，史語所第一次發掘山東龍山鎮城子崖遺址。

(四)是歲先生在《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及其他刊物發表之論著，計有：

- 1.戰國文籍中之篇式書體
- 2.大東小東說
- 3.論所謂五等爵
- 4.姜原
- 5.新獲卜辭寫本後記跋
- 6.本所發掘安陽殷墟之經過
- 7.明清史料發刊例言（以上收入《傅斯年全集》第三、第四冊）
- 8.安陽發掘報告。（載《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期）<sup>⑦</sup>

先生的〈大東小東說 兼論魯燕齊初封在成周東南後乃東遷〉一文的主要內容是：

先生認為大東小東是地理名稱。《詩經·魯頌·閟宮》云「奄有龜、蒙，遂荒大東」。已明指大東所在，即泰山山脈迤南各地，今山東境，濟南泰山迤南，或兼及泰山東部。而小東當今山東濮縣河北濮陽大名一帶，自秦漢以來所謂的東郡。「武王伐紂，其結果誅討而已，猶不能盡平其國。紂子祿父仍為商君焉，東土之未大定可知也。武王克殷後二年即卒，周公攝政，武庚以商奄淮夷畔，管蔡流言，周室事業之不墜若線。周公東征，三年然後滅奄。多士多方諸辭，其于殷人之撫柔蓋致全力焉。營成周以制東國，其于守防蓋甚慎焉。猶不能不封微子以奉殷社，而緩和殷之遺民，其成功蓋如此之難且遲也。乃成王初立，魯燕齊諸國即可越殷商故城而建都于海表之營丘，近淮之曲阜，越在北狄之薊丘，此理之不可能也。今以比校可信之事實訂之，則知此三國者，初皆封于成周東南，魯之至曲阜，燕之至薊丘，齊之至營丘，皆後來事也。」

<sup>⑥</sup> 《傅孟真先生年譜》，頁31。

<sup>⑦</sup> 《傅孟真先生年譜》，頁31-32。

《傅斯年文物資料選輯》，頁235。



燕國 《史記·燕世家》載：「周武王之滅紂，封召公于北燕。其在成王時，召公爲三公。自陝以西，召公主之；自陝以東，周公主之。」召公既主陝以西之地，其封國自然不會在薊丘（即今之北京附近）。尤其武王克殷後，東方尚未平定，故不可能在北京附近建立燕國。按「燕」字金文皆作鄩，在漢代潁川、汝南二郡（均在今河南省境內），有鄩縣、召陵縣，有燕有召，「其爲召公初封之燕無疑也。」

魯國 《詩經·魯頌·閟宮》兩次言及分封魯國之事，一、王曰「叔父！嘉爾元子，俾侯于魯，太啓爾宇，爲周室輔！」二、「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這是初命伯禽侯于魯，繼命魯侯侯于東，」文義明顯。「如無遷移之事，何勞重複其辭？」春秋時成周（又稱洛邑）東南有魯縣（今河南魯山縣），魯國初封可能就在此地。《史記》載周公當危難時出奔楚，「如非其封地，何得于艱難時走之乎？此亦魯在魯山之一證也。」周公子受封者，除伯禽爲魯公，一子嗣周公封于王畿外，其他諸子（除蔣國外）封國均在魯縣東北一條線上。

齊國 《國語·周語》：「齊許申呂由太姜」，據此可知齊以外戚而得封。從《左傳》看來，申、呂、許均在成周之南，即今河南省西部地區。傳記稱齊太公爲呂望，《尚書·顧命》稱公爲呂伋。「此所謂呂者，當非氏非姓。男子不稱姓，而國君無氏。」則此呂爲封邑無疑。據此可知太公初封于呂，後來遷至齊，故其後代仍然稱呂。呂東遷建齊國後，呂之故地仍爲一封國。是否爲太公望之後不可考，「其爲諸姜則信也」。

據詩、書記載，「周之成功，非一世完成，蓋自太王至宣王數百年中之功業，」後人誤以宣王之後齊、魯燕之地爲周初封國，與事實甚不相符。②

## 中華民國二十年（1931年） 三十六歲

- (一)春，自北平赴安陽小屯，視察殷墟發掘情形，和同仁共同生活了三天。
- (二)主持史語所務，兼在北大教課。是歲，「九一八事變」起。

1. 蔣夢麟云：「當我在民國十九年回北京大學時，孟眞因爲歷史研究所搬

② 《傅斯年全集》第三冊，頁9-20。

到北平，也在北平辦公了。九一八事變後，北平正在多事之秋，我的『參謀』就是適之和孟真兩位，事無大小，都就商於兩位。他們兩位代北大請到了好多位國內著名的教授，北大在北伐成功以後之復興，他們兩位的功勞，實在是太大了。在那個時期，我才知道孟真辦事十分細心，考慮十分周密。對於人的心理也十分瞭解，毫無莽撞的行動。還有一個特點使我永遠不能忘記的，他心裏想說什麼就說什麼。他說一就是一，說二便是二，其中毫無夾帶別的意思，但有時因此會得罪人。」

陶希聖云：「民國二十年，孟真在北平，擔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同時主持北京大學史學系。我到北京大學教書，九一八事件發生，北平圖書館開了一個會，孟真和我都在座。他慷慨陳詞，提出一個問題：『書生何以報國？』大家討論的結果之一，是編一部中國通史；此後北大史學系即以這一事業引為己任。『書生何以報國』這一句話始終留在同仁的心裏，激勵著大家來工作。」<sup>②</sup>

##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 三十七歲

(一)主持史語所務，兼在北大教課。

(二)「九一八事變」後，日寇陷我東北，先生至感憂憤。五月，先生與丁文江、胡適、蔣廷黻等創辦《獨立評論》週刊。先生屢於其上，發表文字，鼓吹抗日。

(三)日本軍國主義份子為了使佔領的中國東北地區合法化，便大加製造輿論，為文宣揚「滿蒙在歷史上非支那領土」，而竭力支持「滿洲國」。先生為了駁斥日人這種謬論，增進國人對東北歷史的了解，於是他日以繼夜，奮筆疾書，在十月就出版了他所著的《東北史綱》第一卷，以不容置辯的歷史事實證明了東北自古就是中國的領土。他並在自序中說：「國人不盡無恥之人，中國即非必亡之國。」顯示出他對「不抵抗主義」者的痛恨！此書由李濟節譯為英文，並將譯本送交國際聯盟李頓調查團（Lytton Commission）以為參考，甚受重視，並於報告書中表示東北是中國

<sup>②</sup> 《傳孟真先生年譜》，頁32-33。

領土。「滿洲國」乃日本武力造成的結果。故《東北史綱》是先生「書生報國」的一次嘗試和具體實踐。惟因倉卒成書，其中不無小疵，其後先生頗思重加修訂，終未如願。

陳槃云：「東北事變，大局震盪，孟眞師憂心如焚，百忙中而有《東北史綱》之作。這部用民族學、語言學的眼光和舊籍的史地知識，來證明東北原本是我們中國的郡縣；我們的文化種族，和這一塊地方有著不可分離的關係。這種史學方法和史識，是最現代的、科學的。但出版以後，頗受人批評。其實這書的間架輪廓，非高手不能辦。批評的人從細微末節著眼，當然不無話可說。但是能批評的人，卻不一定就能搭起這樣的間架，描畫出這樣的輪廓。『前修未密，後出轉精』，鑿荒開山的工作是創造的、艱難的，後人跟著來做補苴罅漏的工作是容易的。孟眞師寫文章，有時只憑記憶，當然疏忽的地方也是不能免的。但吹毛求疵，以瑕掩瑜，這種態度是不公平的。」

（四秋，自北平赴安陽及濬縣視察發掘情形，在安濬兩地停留凡四日。

（五）是歲先生在《獨立評論》及《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等刊物發表之論著，計有：1.郵政罷工感言 2.監察院與汪精衛 3.日寇與河北天津 4.「九一八」一年了！ 5.國聯調查團報告書一瞥 6.陳獨秀案 7.多言的政府 8.這次的國聯大會 9.法德問題一勾（以上收入《傅斯年全集》第五冊） 10.教育崩潰之原因 11.教育改革中幾個具體事件 12.教育崩潰的一個責任問題——答邱椿先生 13.改革高等教育中幾個問題 14.再談幾件教育問題（以上收入同上書第六冊） 15.明成祖生母記疑。（收入同上書第三冊）此十五篇文章內容大致分爲兩類：一是對時局的議論，鼓吹抗日救國。二是探討學校教育。<sup>③</sup>

馬亮寬云：「以『九·一八』事變爲起點，日寇的一系列舉措顯示了滅亡

③ 《傅孟眞先生年譜》，頁33-35。

《傅斯年——大氣磅礴的一代學人》，頁211-213。

《傅斯年文物資料選輯》，頁235。

中國的野心，中華民族已處于生死存亡的關頭，救亡圖存成為中國人最為迫切的課題，怎樣實現救亡圖存？應該依靠什麼力量實現救亡圖存？這些問題，傅斯年都進行過認真的思考、研究和探索。他最後得出結論：中華民族只有團結振作，發憤圖強才能轉危為安，由弱變強。他寫文章動員民衆，提高人民抗日必勝的信心，在許多文章中他反覆宣揚只要人民奮起抗日，中國人民一定能取得最後勝利。他在 1932 年《獨立評論》十八號上發表的〈『九·一八』一年了！〉一文中，分析了『九·一八』事變一年來的變化和形勢，指出了政府軟弱，上層苟安等令人失望的現象。不過他認為往更深一層看，中國還是有希望的，這種希望來自人民，來自任何力量都難以泯滅的民族精神。他說：『中華民族自有其潛藏的大力量，三千年的歷史告訴我們，中華民族是滅不了的，而且沒有今日天造草昧之形勢，民族是復興不來的。』他認為，從深層認識，這次民族危機正是民族復興的機會和條件，爲了提高人民抗戰必勝的信心，他又對中國的歷史和現實進行了分析和總結，他說：『中國人之所以能永久存立者，因其是世界上最耐勞苦的民族，能生存在他人不能生存的環境中，能在半生存的狀態中進展文化。』傅斯年從中國人民智慧、文化素質等方面論述了其優點和長處外，最後強調說：『我們若以民族的希望爲宗教的信仰，以自身之勤勉工作各盡其職業爲這信仰之行事，則大難當前，儘可處之泰然，民族再造，將貢一份助力。宋明的道學先生尙能以四書五經養其浩然之氣，我們不能以近代知識養我們的浩然之氣嗎？我們的知識不使我們有失望之餘地，我們的環境不許我們有懈惰的權利。』一句話，要求中國，必須使整個中華民族振作起來，自己拯救自己。<sup>①</sup>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1933 年） 三十八歲

(一)春，遷歷史語言研究所至上海，兼在北大教課。

(二)夏，兼任社會科學研究所所長及中央博物院籌備主任。

<sup>①</sup> 馬亮寬，〈書生報國〉（《傅斯年——大氣磅礴的一代學人》，頁 218 - 219。《傅斯年全集》，第五冊，頁 74 - 85。

朱家驊云：「廿二年春我還服務於教育部，以很少的經費請他負責籌備中央博物院，他竟能以這些少得可笑的錢，心血規劃，樹立初基。以後他雖因職務關係推請李濟之先生繼任，但他也始終深切關心的。」

(三)歷史語言研究所調查河南與關中方言。

(四)建議北平圖書館移居延漢簡於北京大學文史研究所，增加人員整理。

(五)是歲一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外編第一種《慶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刊載了先生的名作〈夷夏東西說〉。此外，先生在《獨立評論》發表之論著，有 1. 中國人做人的機會到了。2. 國聯態度轉變之推測等篇。(均收入《傅斯年全集》第五冊。)②

張光直評論先生的名作〈夷夏東西說〉云：「傅先生是一位歷史天才，是無疑的：他的〈夷夏東西說〉一篇文章奠定他的天才地位是有餘的。這篇文章以前，中國古史毫無系統可言。傅先生說自東漢以來的中國史，常分南北，但在三代與三代以前，中國的政治舞臺，在河、濟、淮流域，地理形勢只有東西之分，而文化亦分為東西兩個系統。自傅先生〈夷夏東西說〉出現之後，新的考古資料全都是東西相對的：仰韶——大汶口，河南龍山——山東龍山，二里頭（夏）——商，周——商、夷。傅先生的天才不是表現在華北古史被他的系統預料到了，而是表現在他的東西系統成為一個解釋整個中國大陸古史的一把總鑰匙。中國文明史不但在河、濟、淮三河流域有東西對立的現象，而且如傅先生也沒有想到的，在整個中國大陸東西對立都是很顯著的現象與研究題目。在新石器時代，長江流域有中游的大溪——屈家嶺——青龍泉文化系列在西與馬家濱——崧澤——馬橋文化系列在東。東南海岸，包括台灣海峽兩岸，有大坌坑文化，在東，與內陸山區文化顯然不同。到了青銅時代，內陸（即西）從長城一帶到整個華北的中、西部，是古典式的夏、商、周文明，但是殷商文明還是屬於東方的；它和東海岸的聯繫太多了。沿海的文明當然會與內陸的殷商文明發生互動關係，但是沿海的夷人文明與內陸的

② 《傅孟真先生年譜》，頁 35 - 36。《傅斯年文物資料選輯》，頁 235。

殷商文明（雖然源於東方）仍形成對峙局面。我相信即到東漢以後，中國史雖然常分南北，東西之分仍是主線。近年《河殤》作者，將中國文明分為黃、藍兩色，以黃色文明為傳統，重保守、在西；以藍色文明為創新，重變革，在東。這還是不出於傅先生的如來手掌心。〈夷夏東西說〉不是很長的一篇文章，但是有了這篇文章以後，歷史學者看中國史便有了一個與前不同的角度。這樣的文章可以說是具有突破性的。傅先生的古史文字中，無疑以此文為首。但他的其他的文章也是篇篇擲地有聲的。】<sup>③</sup>

##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1934年） 三十九歲

(一)主持史語所務，兼在北大教課。

(二)三月，先生在《大公報》發表〈所謂國醫〉一文，對「國醫」理論，作嚴厲之批評。各地「國醫」及其辯護者，紛紛著文反擊。九月，先生復於《獨立評論》發表〈再論所謂國醫〉以答之。近代以來，對「國醫」理論作正面而澈底之評論者，先生實為第一人。

(三)夏，與丁夫人離婚，時丁夫人在濟南。丁夫人工書善文，先生遊學任職在外，夫人則陪侍太夫人家居，同處之日頗少。嗣以新舊習慣不同，遂告離異。八月五日，與俞大綵女士在北平結婚，女士畢業於上海滬江大學，長於文學，尤擅英語。

(四)五月，歷史語言研究所調查浙南畬民。六月，調查安徽徽州方言。

(五)社會科學研究所改組，民族學組歸併於歷史語言研究所，改稱第四組，兼設人類學實驗室，統計學實驗室，從事西南人種調查。

(六)秋，侯家莊西北岡殷代王陵出土。

(七)冬，遷歷史語言研究所至南京，建立語言實驗室。先生仍留北平。

(八)是歲先生在《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獨立評論》、《大公報》等刊物發表之論著，計有：1.周東封與殷遺民 2.城子崖序（以上收入《傅斯

---

③ 韓復智主編，《傅斯年·董作賓先生百歲紀念專刊》張光直序，台北，中國上古秦漢學會發行，民國84（1995）年12月10日出版，頁2。



年全集》第三冊) 3.〈不懂得日本的情形!〉 4.溥逆竊號與外部態度  
5.睡覺與外交 6.今天和一九一四 7.日俄衝突之可能(以上收入同上書第五冊) 8.大學研究院設置之討論 9.青年失業問題 10.所謂「國醫」 11.再論所謂「國醫」 12.答劉學濬〈我對於西醫及所謂國醫的見解〉等篇。(以上收入同上書第六冊)。<sup>⑭</sup>

〈周東封與殷遺民〉一文原為先生所著《古代中國與民族》一書中之一章。先生云：「是書經始於五年以前，至民國二十年夏，寫成者將三分之二矣。日本寇遼東，心亂如焚，中輟者數月。以後公私事紛至，繼以大病，至今三年，來能殺青，慚何如之！此章大約寫於十九年冬，或二十年春，與其他數章於二十年十二月持以求正於胡適之先生，適之先生謬為稱許，囑以送刊於《北大國學季刊》。……」當胡適讀完先生〈周東封與殷遺民〉原稿後送還時夾了一張短簡云：「大作極好，佩服佩服。」胡適後來回憶他受到此文的影响時說「孟真有絕頂天才，他替我解決了《中國哲學史》上不能解決的問題，我接受了他的觀念，寫了一篇五萬字的文章，叫做〈說儒〉。從這個觀念來講古代思想，根本推翻了我過去對於中國古代思想史的見解」。<sup>⑮</sup>

##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 四十歲

(一)主持史語所務，兼在北大教課。

(二)一月，成立明清史料復刊會。

(三)五月，自北平赴安陽視察發掘情形。

石璋如云：「那時是殷墟第十一次發掘，所用工人在三百人以上，為殷墟發掘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也是中國的考古工作在國際間最煥赫的時期。約在五月中旬，氣候已經相當的熱了，他和法國的東方學者的伯希和

<sup>⑭</sup> 《傅孟真先生年譜》，頁36-37

《傅斯年文物資料選輯》，頁235。

<sup>⑮</sup> 《傅斯年全集》第三冊，頁158。

《傅斯年文物資料選輯》，頁83。

(Paul Pelliot) 先生到達安陽。伯希和先生對著那樣偉大的陵墓，那樣排列整齊的小墓，那樣大量並精美的燦爛的器物，在孟眞所長面前，不斷的驚訝和讚嘆。在安停留二日後返所。」

(四)歷史語言研究所調查江西各縣方言。秋，開始調查南方及西南少數民族。

(五)九月十五日，子仁軌生。

羅家倫云：「說到聰明的孩子仁軌的命名，確有一件可紀念的故事。有一天孟眞對我說：『我的太太快要生孩子了，若是生的是一個男孩，我要叫他做仁軌。』我一時腦筋轉不過來，問他說：『爲什麼？』他說：『你枉費學歷史，你忘記了中國第一個能在朝鮮對日本兵打殲滅戰的，就是唐朝的劉仁軌嗎？』從這種史蹟上，預先爲兒子命名，他內心所蘊藏的是多麼強烈的國家民族意識！」

(六)「九一八事變」後，日寇侵華日亟，先生憂傷國事，頻年發表言論，鼓吹抗日，反對華北特殊化，甚爲日人及親日份子所忌。先生雖處險境，仍不稍抑其愛國之誠。

1. 羅家倫云：「說到抗日的精神來，孟眞在北平環境裡所表現的真是可敬可佩。當冀察事變發生，日本在鬧華北特殊化的時候，許多親日派仰人鼻息太過度了。北平市長宋哲元幕僚蕭振瀛招待北平教育界的一席話，儼然是爲日本招降，至少是要北平教育界閉口。在大家皇惑之際，只有適之先生和孟眞挺身而出，當面教訓蕭振瀛一頓，表示堅決反對的態度，誓死不屈的精神。於是北平整個渾沌的空氣，爲之一變，教育界也偶然成爲左右北方時局的重心。孟眞這種聲張正氣的精神，是使他不顧一切的。大家不要忘記，那時候的華北，不但是親日派橫行，而且日本特務也公開活動，這是一個生命有危險的局面。」

2. 陶希聖云：「在日本浪人策動冀察自治的時期，孟眞首先反抗，北大同仁群起響應。事情是這樣的：孟眞在蕭振瀛的招待會上，悲憤的壯烈的反對華北特殊化。這一號召，震動了北平的教育界，發起了一二九的示威運動。北京大學同仁在激昂慷慨的氣氛中，開了大會，共同宣誓不南

遷，不屈服；只要在北平一天，仍然作二十年的打算，堅持到最後一分鐘。我們從這一個時期起，就成了真摯的朋友。我很光榮，能夠和這一位叱咤風雲的書生在一起。北京大學從反對冀察自治到與二十九軍合作抗日，這一努力我們都是在一起的。」

(七)冬，自北平赴長沙，探視友人丁文江病。

(八)是歲英國倫敦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展出部份殷墟出土古物。

(九)是歲先生在《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獨立評論》、《國聞週報》、《大公報》等刊物發表之論著，計有：1.夷夏東西說（此文收入《傅斯年全集》第三冊）2.明清史料復刊誌（收入同上書第四冊）3.〈中日親善〉?!?! 4.一夕雜感 5.地方制度改革之感想 6.中華民族是整個的 7.北方人民與國難 8.一喜一懼的國際局面（以上收入同上書第五冊）9.論學校讀經 10.醫生看護的職業與道德的勇氣等篇（以上收入同上書第六冊）。

勞幹評論先生對古史研究之貢獻云：「孟真先生曾擬作《古代中國與民族》一書，遺稿已成大半，尚未整理。這是一個偉大的著作，差不多牽涉到全部中國的古代歷史，所以孟真先生對於古代中國歷史的材料搜集也特別多，並且他也隨時有寶貴的意見。這一類的材料在《集刊》中發表過的，例如〈周頌說〉（附論魯南兩地與詩書之來源），〈大東小東說〉、〈姜原〉、〈周東封與殷遺民〉、〈夷夏東西說〉，都是屬於這一個範圍以內的著作。而《東北史綱》一書，除去對於古代民族的演變有一個正確的整理以外，並且對於東北一地對中國有深切的關係，尤其有一個精詳的闡發。在這許多論文及書籍之中，特別對於殷人在東，周人在西一點，有一個透澈的了解。這一個意見從孟真先生闡發之後，至今差不多已經成為古代中國民族史上的一個定論。根據這個理論來推斷殷周兩部族的來龍去脈，以及中國文化史的淵源與其分合，那就更顯然如在指掌。我想將來縱然地下的材料漸漸的多起來，一定更可以證明這個意見是堅確

不移的。」<sup>⑤</sup>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1936年） 四十一歲

(一)春，自北平移家南京。

(二)主持史語所務。

朱家驊云：「廿五年春，我應蔡先生之約，任中央研究院總幹事。中間奉命主浙，一再堅辭未果，而勢難兼顧，其時蔡先生又患重病在滬，同仁等集議結果，要我暫勿向蔡先生提起，只得勉強拖延下去。雖有時亦分身到院工作，但所有事務，都偏勞孟真代為處理。」

(三)殷墟第十三次發掘 YH127 坑出土完整龜腹甲二百餘版。

(四)歷史語言研究所調查湖北方言。

(五)夏，明清史料裝箱，南運至南京。

(六)冬，「西安事變」發生，先生著論，力主討伐叛軍。

(七)是歲先生在《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獨立評論》及《中央日報》等刊物發表之論著，計有：1.跋明成祖生母問題彙證 2.說廣陵之曲江 3.誰是齊物論之作者 4.春秋公矢魚於棠跋（以上收入《傅斯年全集》第三冊） 5.國聯之淪落和復興 6.北局危言 7.論張賊叛變 8.討賊中之大路 9.國際組織與世界和平 10.歐洲兩集團對峙之再起（以上收入同上書第五冊） 11.我所認識的丁文江先生 12.丁文江一個人物的幾片光彩等篇。（以上收入同上書第七冊）

勞幹云：「歷史語言研究所曾經有系統的整理《明實錄》。《明實錄》的整

⑤ 《傅孟真先生年譜》，頁37-40。

先生之〈夷夏東西說〉一文是在「九一八」以前所作《民族與古代中國史》一書中的三章。這三章是二十年春天寫的，因時局的影響，研究所遷徙兩次，先生的工作全不能照預定呈規，所以這一書始終不曾整理完。民國二十二年把其中三章編成一文，「敬為蔡子民師壽」，刊載於《中研院史語所集刊》外編第一種《慶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直到二十四年，略加修改，始正式出版。參見《傅斯年全集》第三冊，頁86。

理是孟眞先生首先注意到的，搜集了七種本子來校，並且經過故李晉華先生的用心整理，大致已經有頭緒了，因為經費問題，尚未付印。在整理《明實錄》之時，孟眞先生對於明史曾經下過很深的功力，作過「明成祖生母記疑」及「明成祖生母問題彙證」等論文。李光濤君對於明史的若干篇論文，也得到孟眞先生不少的指示。孟眞先生對於明清史事，如明太祖的生平，明代后妃的教育與儲嗣文化標準問題，孝欽皇后與清季變法問題，都曾經很詳細的對同仁說過，希望將來能夠將大家記憶中的湊到一起。」<sup>⑦</sup>

##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 四十二歲

(一)主持史語所務，兼代中央研究院總幹事。

(二)四月，洽購嘉業堂所藏《明實錄》鈔本。

(三)「七七事變」起，抗戰軍興，先生參加政府召集之廬山談話會及國防參議會。

程滄波云：「孟眞參預政治，還是「七七」以後的事。廬山談話會結束後，跟著就是「八一三」，當時南京成立了一個國防參議會，大概各黨各派領袖及文化教育界名流，均有少數的領袖人物參加，孟眞便是其中的一位。廬山下山後，他住在南京新住宅區北平路中英文化協會，後來胡適之也住在那裏。中英文化協會離我南京的寓所只有幾十步路，當時還有好幾位北大出來的教授，都同住在那裏，他們幾乎每天到我寓中吃飯。胡適之後來病痢，孟眞每天陪他到寓中吃稀飯。後來適之不能起床，每天派人把稀飯送到他房中，孟眞還是每天來的。從八月中到十月底我去歐洲，中間兩個多月，幾乎和孟眞每天在一起。當時敵愾同仇，言論完全一致，所以大家除了團結對外，並無其他特殊的意見。

(四)七月，將院中文物運至南昌及長沙。八月，遷歷史語言研究所至長沙。十月，將南昌之文物再轉運到四川重慶大學。

⑦ 《傅孟眞先生年譜》，頁40-42。

《傅斯年文物資料選輯》頁236。

朱家驊云：「次年『七七事變』，淞滬戰事旋起，浙江首當其衝，不能稍離，而京中告急，更無法兼顧院事。在這一年餘之中，院內諸事無論巨細，悉承孟眞照料，甚至全院西遷，也都由他一手辦理。」

(五)是歲先生在《國聞週報》，發表〈西安事變之教訓〉一文。(收入《傅斯年全集》第五冊)⑧

##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 四十三歲

(一)春，遷歷史語言研究所至昆明。

(二)七月，兼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赴漢口出席第一次大會。

程滄波云：「第二年夏天，我從歐洲回到漢口，當時全國四方的人物，雲集在武漢，且在參政會成立的前夕。從那時起，孟眞對政治的興趣，偏重在內政方面，尤其在澄清內政的空氣。」

(三)秋，移家昆明。

(四)十月，遷歷史語言研究所至昆明郊外，以避敵機空襲。先生旋赴重慶出席國民參政會第二次大會。

(五)十一月，先生在《中央日報》發表〈波蘭外交方向之直角轉變〉一文。(收入《傅斯年全集》第五冊)

(六)十二月，山東省專員范築先抵抗日寇戰死聊城，先生悼以詩云：「一、受任孤危際，撫民水火中，歆血召英俊，誓死奏膚公；郡陷廿城在，北門管鑰通，方期收河朔，何意殞方戎。二、東郡百戰地，勝節著當年，古有禦胡守，平原與常山。阻寇遏其勢，王師于以旋，一門多忠烈，顏范應俱傳。三、島夷成弩末，中乾徒外強，逆賊爭腐鼠，變亂起蕭牆；國軍正東顧，億兆擔壺漿，北定中原日，太牢告國殤。四、立國有大本，亮節與忠貞，三齊多義士，此道今不傾。一死泰山重，再戰濁濟清，英英父子業，百世堪儀刑。」

先生不常作詩，尤其是舊詩。但在抗戰期間，爲了景慕忠烈，他曾破例

⑧ 《傅孟眞先生年譜》，頁42-43。

《傅斯年文物資料選輯》，頁236。



作了幾首舊詩。上四首詩即是其中一部分。

(七)先生熱愛民族，他寫的《中國民族革命史》是他未成完的著作，也沒有發表過。先生撰寫此書的時候，正值抗日戰爭最艱苦的階段。其內容是以歷史為根據，說明中華民族的整體性及其抵禦外侮百折不撓的民族精神，用以鼓勵民心士氣，增強國人的團結和民族自信心。文中強調「中國民族者，不以侵略人為是，而亦不甘侵略之民族也。」「中國民族者，雖亦偶為人滅其國，卻永不能為人滅其民族意識，縱經數百年，一旦得環境之遷易，必起而解脫羈絆也。」「中國民族者，永不忘其失地者也。」「中國民族，雖有時以政治紊亂故，頓呈虛弱之象，然一旦政治有方，領導得人，可由極弱變為極強。」以上所引，實為先生民族思想的精義所在，至今仍有振敝起懦的作用。<sup>③</sup>

##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1939年） 四十四歲

(一)主持史語所務。

(二)二月及九月，赴重慶出席國民參政會第三及第四次大會。

(三)四月，先生在昆明《大公報》發表〈地利與勝利〉與〈抗戰兩年之回顧〉等文。（收入《傅斯年全集》第五冊）

(四)五月，歷史語言研究所參加莫斯科中國藝術展覽會，展出部份安陽出土文物。七月，開放歷史語言研究所圖書供給遷至於昆明的學術機關使用。十二月，調查貴州苗族。<sup>④</sup>

##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1940年） 四十五歲

(一)主持史語所務。

(二)四月，赴重慶出席國民參政會第五次大會。

<sup>③</sup> 《傅孟真先生年譜》，頁43-44。

傅樂成，〈傅孟真先生的民族思想〉（氏著《時代的追憶論文集》，頁147-157。）

<sup>④</sup> 《傅孟真先生年譜》，頁44。

《傅斯年文物資料選輯》，頁236。

(三)秋，兼任中央研究院總幹事。

朱家驊云：「廿九年，我繼蔡先生之職，請孟真擔任總幹事，爲了院，爲了朋友，他欣然的答應下來。總幹事是院內實際行政的總樞，而孟真辦事又是特別富於責任心，因而，在這個時期裡，他就得了高血壓的病，病後始脫離總幹事職務。這件事使我至今猶覺耿耿。」

(四)八月，促成寄存於香港之居延漢簡安全抵達美國國會圖書館，免遭戰火。

(五)冬，遷歷史語言研究所至四川南溪縣李莊鎮。

(六)十二月，續任國民參政會第二屆參政員。

(七)歷史語言研究所調查雲南方言，少數民族語言。

(八)是歲先生出版之著作以及在《今日評論》等刊物發表之論著，計有：

1. 性命訓辨證（收入《傅斯年全集》第二冊） 2. 中國音韻學研究序（收入同上書第三冊） 3. 汪賊與倭寇——一個心理的分解等篇。（收入同上書第五冊）<sup>④</sup>

先生撰寫的《性命古訓辨證》一書之大綱爲：序、引語、上卷釋字：第一章提綱、第二章周代金文中「生」「令」「命」三字之統計及其字義、第三章周語中之「性」「命」字、第四章詩經中之「性」「命」字、第五章左傳國語中之「性」「命」字、第六章論語中之「性」「命」字、第七章論告子言「性」實言生兼論孟子一書之「性」字在原本當作生字、第八章論荀子性惡正名諸篇中之「性」字在原本當作生字、第九章論呂氏春秋中「性」字在原本當作生字、第十章「生」與「性」「令」與「命」之語言學的關係。

中卷釋義：第一章周初人之「帝」「天」、第二章周初之「天命無常」論、第三章諸子天人論導源、第四章自類別的人性觀至普遍的人性觀、第五章總敘以下數章、第六章春秋時代之矛盾性與孔子、第七章墨子之非命

<sup>④</sup> 《傅孟真先生年譜》，頁44-45。

《傅斯年文物資料選輯》，頁236。

論、第八章孟子之性善論及其性命一貫之見解、第九章荀子之性惡論及其天道觀、第十章本卷結語。下卷釋緒：第一章漢代性之二元說、第二章理學之地位。<sup>④</sup>

勞榘評先生之《性命古訓辨證》云：「孟眞先生的《性命古訓辨證》，對於中國哲學思想史是一部很重要的典籍。在上卷他先追溯『性』『命』二字的來源，確定爲性字從生而來，命字從令而來。性與生，命與令到戰國時期用字上還沒有顯明的辨別，雖然在思想系統上已經賦予了新的意義了。到了漢代才正式分別使用，因此漢代學者才將古書校改，又因爲並不能全部改過，這個痕跡現在還可以看出來。在中卷他推論殷周以來的宗教及哲理，對於『上帝』觀念的產生，及周初『人道主義』的發見，俱有獨到的見解；而從性命二字的解釋來推斷孔墨荀孟以及名法的異同及其關係，尤其使人感到有不少新的啓發。最後在下卷講到漢儒和宋儒的性命理論，然後更使人了解宋元理學對前代一貫相承的系統，尤其對於朱學淵源更有好的分析。孟眞先生對於朱學本來是相當注意的，對於《朱子語類》曾看過許多遍。到臺灣以後曾選《孟子》一書爲臺大一年級國文讀本，對孟學的系統不僅比以前更爲推崇，並且更有刻意的研討，可惜已經來不及寫定了。」（樂成謹案：民國三十六年，中央研究院辦理第一屆院士選舉，先生爲候選人之一。其時先生所提出之著作，即《性命古訓辨證》一書及〈夷夏東西說〉一文。並自作簡介曰：「一、《性命古訓辨證》，此書雖若小題而牽連甚多。其上卷統計先秦西漢一切有關性命之字義，其結論見第十章。本章中提出一主要之問題，即漢字在上古可能隨語法而異其音讀也。以語言學之立點，解決哲學史之問題，是爲本卷之特點，在中國尙爲初創。其中泛論儒墨諸家之言性與天道，引起不少哲學史上之新問題，富於刺激性。其地理及進化的觀點，自爲不易之論。其下卷乃將宋學之位置重新估定。二、〈夷夏東西說〉，此文論遠古中國東西文化之不同，極富新義。國內批評者如徐炳昶、王獻唐諸氏，

④ 《傅斯年全集》第二冊，頁159-404。

國外批評者如 Owen Lattimore，皆以爲定論。」可知先生視之爲代表作也。)<sup>④</sup>

## 中華民國三十年（1941年） 四十六歲

(一)主持史語所務。

(二)三月，患高血壓症，在重慶歌樂山中央醫院養病，七月出院。五月，先生致函友人戚壽南敘述病況，略云：「去年冬初，敝所奉命自昆明遷川南，其時至爲忙碌；又以兼任敝院幹事長之故，更感生活之不安定。今年在二三月中，五十日內，一連開會五次，長者如參政會之十日，短者不過一日。但屬於敝院者，須弟事先準備，又以有各種不如意之事，時有暴怒。故弟自一月初，即覺兩眼不適，然彼時尚能登山走路也。二月十八日，曾請林文炳大夫檢查（未放大瞳人），謂目光並無變化，眼球中血管，亦未見有何種病態象徵，勸弟在內科檢查。弟以當時各種會在即，未能檢查。以後眼睛更不舒服，直至三月廿日，弟覺身上甚有不適，住市民醫院一查，知血壓 194 (sys) —— 140 (dias)。朱景蘭大夫囑服 Lunimot，一日之後，知血壓 178 - 128。廿八日，弟即入中央醫院，直至現在，在應元岳及錢德兩大夫診治中。三月廿一日，發現眼睛甚難過，入中央醫院後，林大夫檢查結果，兩眼之動脈管比靜脈管爲細，但亦不一致如此粗細不均，左眼有一毛細靜脈管破裂。」

(三)歷史語言研究所與中央博物院合作調查岷江沿線遺址。

(四)夏，歷史語言研究所與中央博物院合組「川康民族考察團」展開川西康東民族調查。

(五)九月，辭去中央研究院總幹事職。

(六)十月，母李太夫人卒於重慶，享年七十五歲。

(七)歷史語言研究所調查四川各縣方言。

(八)十一月，出席國民參政會第二屆第二次大會。

(九)冬，移家南溪李莊。

<sup>④</sup> 《傅孟真先生年譜》，頁 45 - 46。

(十)十二月，香港被日軍攻陷，歷史語言研究所存於香港九龍的文物悉燬於戰火。<sup>④</sup>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1942年） 四十七歲

(一)主持史語所務。

(二)四月，歷史語言研究所與中央博物院，中國地理研究所合組「西北史地考察團」，展開調查。

(三)先生自喪母，悼念不已。二月，致函胡適，敘太夫人染病及喪事辦理經過，略云：「家母在去年十月二十一日，在重慶中央醫院去世矣！七十五歲，不為不壽，但照她的身體，應當活到八十五乃至九十以上。他去世前兩個星期，還與小孩們玩，每日做飯做衣，非此不樂。自離南京後，她即與舍弟一起，在重慶城郊同住。去年初，大家皆窮，我仍勉力供給她老人家肉食無缺。雙十節前數日，生一次瘡疾，已好；雙十節仍為舍弟小兒作生日，樂甚。過雙十節，瘡疾又犯，以寓在衛生署左近，請了金署長找的衛生署之醫生，先上來很好，忽然沈重。送入中央醫院，（未早入者，因此院亦簡陋，髒甚。）而不起矣。致死之病狀難定，遍身發黃，醫斷為 Obstructive jaundice。于是作一小 autopsy，則十二指腸上之通管，為一大塊石頭所塞住。然則在南京時已鬧起之『急性胃炎』，實即此事之誤斷也。中間經多醫，在重慶並住了一次仁濟醫院，皆認為胃，以其平日健康，故若干病狀不露。設若在南京時，在中央醫院多住幾日，我想總可以看出病來，此則悔之無及矣！在南京住了不到一年半，家中無月不在緊張中，夫何可言！設若不是我去年至今這一場大病，也或者早到醫院去也。家母葬於歌樂山風景絕佳處，作成一水泥之墳，甚堅，欲移亦可。未開弔，未發訃，事後登報耳。」同函並敘近年生活狀況，略云：「前年秋冬，奉命遷移。彼時交通無辦法，竭盡平生之力而謀之，一面跑警報，一面辦這些事，故每日有時走至三十里，幸而把研究所搬了

④ 《傅孟真先生年譜》，頁 46 - 47。

《傅斯年文物資料選輯》，頁 237。

(由昆明北郊，至四川南溪縣李莊，兩處皆是一片大好房子)。十一月一日到重慶，駱先（樂成謹案：駱先，朱家驊字。）勉強我做總幹事，當時有一不了之局，遂勉強答應，預備著一年找人。於是一陣事忙，開了幾次會，遂不支持。入中央醫院（三月二十八日），群醫認為危急。適三月廿日左右，左眼血管破了一個，醫更急，當時友人無不悲觀。但在中央醫院一時中，總算養的好，出院時，血壓是低了，以後高高下下者幾個月。我在歌樂山養病，以離中央醫院近也。出院時為七月七日，直到九月中，才可以說能走點路。一夏天轟炸，只是聽著他在頭上過，任之而已。方能走路不久，即遭家母之喪，喪後看地，安葬，一陣大跑，不量血壓了。故自夏徂秋，也未曾好養也。其時參政員開會，我出了一半席，蓋證明我之未死也。遂於十二月三日動身上水來李莊，七日至，冬季上水行船，其難如此。到後一量血壓，打破一切紀錄！於是大吃藥，睡了兩週，又算差不多了。目前半工半休息，這個病是不會好，只希望拖得好，能拖得好，願足矣！病中想來，我之性格，雖有長有短，而實在是一個愛國之人，雖也不免好名，然比別人好名少多矣。心地十分淡泊，歡喜田園舒服，在太平之世，必可以學問見長。只是凡遇到公家之事，每每過量熱心，此種熱心，確出於至誠，而絕非有所為。遇急事膽子也大，非如我平常辦事之小心，有時急的強括不舍，簡直是可笑。平日好讀老莊，而行為如此。有此性情，故遇有感情衝動之事，心中過份緊張。這種感情衝動，私事甚少，而為公者極多。性情如此，故得此病，更不易治。此等性情，自天外人看，未知還有趣否？但在中國確算比較少的了。近日又讀莊子，竭力自己為自己想開，何必一人懷千古之憂，一身憂國家之難。讀來讀去，似乎有些進步，此竅還是半通不通的。古人有以天下事為己任之說，一個人如此想，多半是誇大狂，我向不以此言為然。但自己不自覺之間，常在多管閒事，真把別人事弄成自己的事。此比有此意識者更壞事，以其更真也。我本以不滿於政治社會，又看不出好路線來之故，而思遁入學問。偏又不能忘此生民，于是在此門裏門外跑去跑來，至於咆哮，出也出不遠，進也住不久，此其所以一事無成也。



今遭此病，事實上不能容我再這樣，只好從此以著書爲業，所可惜者，病中能著幾何，大是問題耳。但只要能拖著病而寫書，其樂無窮。論我之學問，自覺方在開始，但現在不學問了，就在此時著書，而且把考據之書放在後面，目下先寫『我的哲學』。這些『哲學』，包括下列書：一、《文化鬥爭》Kultur Kampf。二、《原人》。三、題目未定，其意思是 Causality and Chance in History。四、想練習一下我有無寫傳記之才，以明太祖爲題（近發現他許多事）。這便夠我辦的了，考據之書，再說。近看段著《戴東原年譜》，頗疑東原之寫字義疏證，亦感於身體不妙而寫。假如他再活十年，一定是些禮樂兵刑之書，而非『抬轎子』之書矣。此事先生有考證否？」同月，先生致友人竹垞生函，亦言及太夫人之喪及個人近況，略云：「不幸者家母于去年十月去世矣，如非在此亂世，或者不致於此，此弟念之不能或忘者也。弟自去年三月，忽然患急性血壓高，幾瀕於危，在醫院住了半年，出來又住數個月。近則移居此間，去鎮上猶遠，醫囑要休息二年也。完全山中人矣！」

（四）七月，續任國民參政會第三屆參政員。十月，赴重慶出席國民參政會第三屆第一次大會。

（五）十二月，歷史語言研究所調查川南苗族。

（六）十二月，先生寫〈大明嘉靖三十三年大統曆跋〉一文。（收入《傅斯年全集》第七冊）<sup>④</sup>

####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1943年） 四十八歲

（一）主持史語所務。

（二）歷史語言研究所調查關中、洛陽陵墓與石刻，以及陝西考古遺址。

（三）九月，赴重慶出席國民參政會第三屆第二次大會。

（四）是歲先生在《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及重慶《大公報》等刊物發表之論著，計有：1.「史料與史學」發刊詞（收入《傅斯年全集》第四冊）

<sup>④</sup> 《傅孟真先生年譜》，頁47-51。

《傅斯年文物資料選輯》，頁237。

2.盛世危言 3.戰後建都問題（以上收入同上書第五冊） 4.跋入境廬詩草 5.丁鼎丞先生七十壽序等篇。（以上收入同上書第七冊）<sup>⑥</sup>

##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1944年） 四十九歲

(一)主持史語所務。

(二)歷史語言研究所調查廣西土語及其他少數民族語言。

(三)五月，歷史語言研究所與中央博物院、北京大學、中國地理研究所合組「西北科學考察團」發掘敦煌墓葬。

(四)六月，歷史語言研究所自辦子弟小學。

(五)六月，爲子仁軌書文文山〈正氣歌〉及〈衣帶贊〉等詩，並跋曰：「爲仁軌兒書文文山先生〈正氣歌〉，〈衣帶贊〉，並以先生他詩補餘幅。其日習數行，期以成誦，今所不解，稍長必求其解。念茲在茲，做人之道，發軌於是，立基於是。若不能看破生死，則必爲生死所困，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矣。」

(六)九月，赴重慶出席國民參政會第三屆第三次大會。

(七)先生爲張自忠將軍于二十九年戰死於襄陽，至是歲殉國四周年，乃作詩追悼，題曰〈悲歌〉，詩句如下：泰山重一死，堂堂去不回，身名收馬革，風日慘雲雷，忠義猶生氣，艱難想將才，中原誰匡濟，流涕楚鄧哀。此外先生還想爲張將軍作一年譜，可惜因事忙，始終未能了卻這樁心願。

(八)是歲先生在重慶《大公報》發表之論著，計有：1.天朝——洋奴——萬邦協和 2.「五四」二十五年 3.我替倭奴占了一卦 4.現實政治 5.第二戰場的前瞻等篇。（均收入《傅斯年全集》第五冊）<sup>⑦</sup>

##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1945年） 五十歲

(一)主持史語所務。

<sup>⑥</sup> 《傅孟真先生年譜》，頁51。《傅斯年文物資料選輯》頁237。

<sup>⑦</sup> 《傅孟真先生年譜》，頁51-52。

傅樂成，〈傅孟真先生的民族思想〉（氏著《時代的追憶論文集》，頁148。）

《傅斯年文物資料選輯》頁237。

(二)四月，續任國民參政會第四屆參政員。

(三)七月一日，先生與黃炎培、褚輔成、章伯鈞、冷遹、左舜生六位國民參政員代表國民參政會從重慶飛赴延安訪問，與中國共產黨商談國共團結，共建國內和平問題。抵達延安機場時受到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的歡迎。並在機場合影。五日返渝。

羅家倫云：「他反對共產黨遠在他在廣州中山大學做教授的時候，他在重慶被國民參政會推舉為訪問延安代表團的五代表之一，他回來以後，和我談過幾次。他和毛澤東因為舊曾相識的關係，單獨聊了一夜天。上天下地的談開了，談到中國的小說，他發現毛澤東對於坊間各種小說，連低級興趣的小說在內，都看得非常之熟。毛澤東從這些材料裡去研究民衆心理，去利用民衆心理的弱點，所以至多不過宋江一流。毛澤東和他慢步到禮堂裡，看見密密層層的錦旗，各處向毛獻的。孟眞諷刺的贊到：『堂哉皇哉！』毛澤東有點感覺到。他痛恨同去的人沒有出息。他說，章伯鈞是由第三黨去歸宗，最無恥的是黃炎培等，把毛澤東送他們的土織毛毯，珍如拱壁，視同皇帝欽賜飾終大典的陀羅經被一樣。孟眞對他們說：『你們把他看作護身符，想藉此得保首領以歿嗎？』可見孟眞知人見事都很精密周到，絕無一般書生之見。」

(四)七月，出席國民參政會第四屆第一次大會。先生自民國二十七年任國民參政員以來，每次會議，發言建議，均以促請政府整刷政風為主，對政要孔祥熙尤多質詢。此外先生在會中竭力反對違背科學之提案，如維護中醫案等，與守舊份子，爭論亦烈。先生於八月一日致夫人函中，敘述開會之經過，略云：「會中的最微妙（亦可說最險惡）的是中央銀行國庫局大舞弊案；會中的最滑稽的是中醫案（末一天），全場十餘人，同時發言，雜以各種怪聲（我們勝利）。」

1. 羅家倫云：「抗戰期間孟眞在國民參政會裡所表現的固然為一般人所欽佩，可是許多人更覺得有聲有色。除了他堅定的擁護抗戰而外，他還為兩種主張而積極奮鬥：一是反對一切違背時代精神，科學理論而開倒車的議案；一是反對危害國民生計的貪污事實。在前一項目之下，如他反

對提倡所謂國醫，就是顯著一例。他認為哈維發明了血液循環三百年之後，到今天還要把人的人體分為上焦中焦下焦三段，簡直是對於人類知識的侮辱。他為這個問題，從抗戰前在南京的時候，就寫文章討論起。因為他研究過實驗心理學，同時自然他也很懂得生理學和生物化學，所以他寫的這些文章，理論非常精闢，文字也非常精彩。說到此地，我又忍不住要提孟真一件趣事，很可以表示他一種特殊可愛的性格。有一次為中醫問題，孟真反對孔庚的議案，激烈的辯論了一場。當然孔庚辯孟真不過，於是他氣了，在座位上辱罵孟真，罵了許多很粗的話。孟真也氣了，說是：『你侮辱我，會散之後我和你決鬥。』等到會散之後，孟真在會場門口攔著孔庚要決鬥了。他一見孔庚年紀七十幾歲，身體非常瘦弱，立刻把手垂下來說：『你這樣老，這樣瘦，不和你決鬥了，讓你罵了罷。』這雖然是一個插曲，也可以看出孟真決不是硬心的人。我常笑他說：『你這大胖子怎能和人打架。』他說：『我以體積乘速度，產生一種偉大的動量，可以壓倒一切。』我為之大笑。可是他真用這個方法，打勝過人，這件事在此地張道藩知道最清楚。至於說到為了他的第二種主張，他真能表現不畏強禦的精神。他認為現在革命過程中的一切犧牲，是為民衆利益的，不是為貪官污吏中飽的，不是為買辦階級發財的。他說：『我擁護政府，不是擁護這般人的既得利益，所以我誓死要和這些敗類搏鬥，才能真正幫助政府。他主張『去惡務盡』，他主張『攻敵攻堅』。而且他一動手攻堅，決不肯中途罷手。有一次在重慶為了某一種公債的案子，他在國民參政會發言，到結束的時候，鄭重聲明他這番話不但在會場以內負責，而且在會場以外也負責，他願意親自到法庭對簿。這話使全場興奮，可是使我為他捏了一把汗。會後我去看他，問他為什麼敢作這樣肯定的話。他說：『我若沒有根據，那能說這話。』於是他取出兩張照片給我看，可見他說話是負責的，絕對不是所謂大炮者可比，也絕不是聞風言事的一流。這種有風骨的人，是值得欽佩的。』

2.程滄波云：「在重慶時期，有一次在參政會開會前，我好幾次到聚興村他住的房內，看他拿著一小箱子，藏在枕頭下面，寸步不離。我問他裡

面是什麼寶貝，他很緊張地說，這是他預備檢舉某大員的證件。後在參政會鬧了一陣，忽然來信說回李莊去讀他的書了。他對政治，喜歡談論，而容易厭倦，偶然奮不顧身的一擊，並不是對政治有興趣，而是激發於士大夫的責任感。他的胸中實在是一張白紙，潔白得沒有一點瑕疵。他終於不做李膺、范滂，而做了郭林宗，這是他的命運，也是今天的時代，究竟與東漢末年有別。」

(戊)八月初，先生在重慶《大公報》發表〈黃禍〉一文，響應政府徵收中央銀行黃金存戶之部分黃金。當時若干「既得利益」階級份子，正謀反對，此文發表後，因贊同者衆，反對之謀遂息，是月先生致夫人函云：「我前幾天很忙，星期三幾個銀行家的參政員請客，我去了。原來請了三十多位住在重慶的參政員，他們所談，許多可恥的，我很氣悶；尤其是批評政府之徵收黃金，我很生氣。回來趕寫了那一篇〈黃禍〉，在大公報，想你已經看到了。我固不怕權勢，也不怕群衆，我以為那篇文章一定要遭許多人的罵，罵雖有之，而效力意想不到之大。有些『既得利益』vested interest 階級的參政員，正在醞釀在駐會委員會決議，推翻政府的辦法。這篇文章不早不晚，恰恰登在最適合的日子。次日，駐會委員會開會，我又發言，博得大多數之贊同。我們勢力雄厚，原提案者孔庚、黃炎培撤回去了！這是星期五，如此鬧一上午。」

(己)八月十日，日本宣佈投降，先生喜極。

1. 羅家倫敘述先生於十日晚狂歡之情形云：「在日本投降的消息傳到重慶的晚上，孟真瘋了。從他聚興村住所裏，拿了一瓶酒，到街上大喝；拿了一根手杖，挑了一頂帽子，到街上亂舞。結果帽子飛掉了，棍子脫手了，他和民衆和盟軍還大鬧了好一會；等到叫不動了，才回到原處睡覺。第二天下午我去看他，他還爬不起來；連說：『國家出頭了，我的帽子掉了，棍子也沒有了，買又買不起。晦氣！晦氣！』這是孟真的本色，孟真不失爲真！」

2. 是月先生致夫人函中，描述十一日慶祝勝利之情形，略云：「第二天（十一）接到參政會通知，大家到秘書處慶祝。我九時半到，則已三十多

人，愈到愈多，皆哈哈大笑，我現在方知舊戲中二人見面哈哈大笑之有由也。抱者，跳者，kiss者，要想安靜一下，談談如何遊行，幾乎辦不到。大家kiss胡木蘭，胡木蘭亦偶報之。我未曾kiss邵先生的夫人，邵先生還見怪，其狂如此。坐了三輛大車，二bus，一卡車，另一（車）軍樂隊，沿途慢行，大聲呼口號，怪叫，遇見美國兵更大呼！直到國民政府，他們還在開會。我們要求主席（樂成謹案：主席謂今總統——編者按即蔣介石總統）出來見，他們不知洋脾氣，請我們進大禮堂。主席出來時，大家歡呼，聲如暴雷。出門時，我遇見熟人打招呼者，皆報之以拳，段書詒後來說，他簡直吃不消。出門遇吳鼎昌，他說：『你不要太興奮。』（彼與我皆患血壓高也。）我即將其一搖再搖。又回到參政會，沿路叫。本是預備到美軍司令部及英美蘇三大使館的，在國府，蔣先生說，尚未完成投降，尚有條件措商，所以就此回去。在參政會仍很熱鬧，下午三時方歸。頓覺極倦，若有大病，一直睡下去，第二天方好。」既而蘇俄侵略東北，先生觀察世局，又復轉喜為憂。先生於是月二十一日致夫人函曰：「東北糟不可言，仍因自己有此大的第五縱隊，非可專罵俄國人，俄國人也太可惡了。美蘇決不會打，亦決不會和好，以後又是九一八至七七那一套，陰陽怪氣，一直鬧幾年下去，中國真吃不消也。」

(戊)秋，任北京大學代理校長。先是政府擬任命先生為北大校長，先生謙辭；並於八月十七日致書蔣主席，推薦胡適。又以胡氏在美未歸，故先生暫允代理。先生致蔣主席書云：「日昨朱部長驪先先生，以尊命見示，謂蔣夢麟先生之北京大學校長出缺，即以斯年承乏。驪先先生勉之再三，云出於鈞裁，強為其難。伏思斯年以狷介之性，值不諱之時，每以越分之言，上塵清聞；未蒙顯斥，轉荷禮遇之隆，衷心感激，為日久矣。今復蒙眷顧，感懷知遇，沒齒難忘。惟斯年賦質愚戇，自知不能負荷世務，三十年來，讀書述作之志，迄不可改。徒以國家艱難，未敢自逸，故時作謬論。今日月重光，正幸得遂初志，若忽然辦事，必累鈞座知人之明。兼以斯年患惡性血壓高，于茲五年，危險逐年迫切，醫生屢加告戒，謂如再不聽，必生事故。有此情形，故於勝利歡騰之後，亦思及覓地靜養



之途，家族親友，咸以爲言。若忽任校務，必有不測，此又求主席鑒諒者也。抑有進者，北京大學之教授全體及一切有關之人，幾皆盼胡適之先生爲校長，爲日有年矣。適之先生經師人師，士林所宗，在國內既負盛名，在英美則聲譽之隆，尤爲前所未有。今如以爲北京大學校長，不特校內仰感俯順輿情之美；即全國教育界，亦必以爲清時佳話而歡欣；在我盟邦，更感興奮，將以爲政府選賢任能者如此，乃中國政府走上新方向之證明；所謂一舉而數得者也。適之先生之見解，容與政府未能盡同，然其愛國之勇氣，中和之性情，正直之觀感，並世希遇。近年養病留美，其政府社會，詢咨如昔，有助於國家者多矣。又如民國二十四年冬，土肥原來北平，勾結蕭振瀛等漢奸，（樂成謹案：《傳記文學》一卷三期，載劉建群〈我與宋哲元將軍的幾次交往〉一文，文中謂蕭曾流涕以道：「人家說我勾結日本人，是漢奸，我若有此心，我算不是我父母所生的。」則蕭又似非漢奸。特記於此，以備一說。）製造其華北特殊化。彼時中央軍與黨部撤去久矣。適之先生奮臂一呼，平津教育界立刻組織起來以抵抗之，卒使奸謀未遂，爲國長城，直到七七。蓋適先生之擁護統一反對封建，縱與政府議論參差，然在緊要關頭，必有助於國家也。今後平津將仍爲學校林立文化中心之區，而情形比前更複雜。有適之先生在彼，其有裨於大局者多矣。越分陳辭，敬乞鑒宥，肅叩鈞安。」

朱家驊云：「抗戰勝利，各校復員，北京大學地位重要。我和他商量，想請胡適之先生擔任校長，他也極力的主張。不過胡先生不能立即回國，結果，又把代理校長推在他的身上。他當時雖表示不願，但北大是他的母校，而胡先生又是他的老師，我以大義相勸，也不得不勉強答應。從昆明遷回北平，再以後來的規復設施，又是一件極繁重的事情，使他身體再度的吃了大虧。」

（八）九月，在重慶參加教育善後復員會議。先生於十月五日致夫人函中敘述開會情形，略云：「上月廿日正式開會，全天在那裏，直到二十五日，發言考第二多，真正累死我。不得不幫顧先忙，結果我捱許多罵，弄得名譽極壞。蔣廷黻綜合之曰：『太上教育部長，太上中央研究院總幹事，

太上北大校長。』我說我只做『太上善後救濟總署署長』，他方無言。事實是韜先好與我商量，而十之七八不聽，然而外人不知也，以爲他的一切由我負責。一次教育會，弄得我成衆矢之的，重慶再不可久居矣。此中笑話多矣。我的名譽反正不佳，只求問心無愧而已。」

(九)九月，接收「北平東方文化研究所」。

(十)十一月，昆明國立西南聯合大學（係北京、清華、南開三大學聯合而成）發生學潮。次月，先生以校務委員身份，前往處理，後來終使學生復課。先生於三十五年一月五日致夫人函中略謂昆明學潮之起源，校內情形複雜，固爲一因，但地方當局之措施，亦殊荒謬。

(十一)是歲先生在《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及重慶《大公報》等刊物發表論著，計有：1.殷曆譜序 2.六同別錄編輯者告白（載《史語所集刊》外編第三種六同別錄）（以上均收入《傅斯年全集》第三冊） 3.羅斯福與新自由主義 4.評英國大選等篇。（以上收入同上書第五冊）<sup>48</sup>

##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1946年） 五十一歲

(一)一月，赴重慶出席政治協商會議。先生於一月七日致夫人函云：「政治協商會情形如此：政治上，三國外長會對中國有責言，於共有利：但上月幾次戰爭，共皆慘敗，（歸綏、包頭、臨城、棗莊、山海關，共皆慘敗。）所以共黨來開會。此會未必有成就，然亦不可免者。」

(二)歷史語言研究所調查川南懸棺葬及川滇交界之彝人。

(三)二月十一日，雅爾達密約正式公布，舉國譁然。是時蘇俄佔領東北，大肆劫掠。先生與王雲五等共二十人，聯合在各報發表宣言，譴責英美，並痛斥蘇俄欺騙世界之偽行及其帝國主義之野心。同月二十五日，先生又在《大公報》發表〈中國要和東北共存亡〉一文，痛言東北之重要，並促請政府及國人，誓與俄寇周旋。由於國人之憤怒與輿論之一致指責，俄軍終於次月撤出東北。

(四)三月，政府擬請先生出任國府委員。二十七日，先生致書蔣主席，謙

<sup>48</sup> 以上見《傅孟真先生年譜》頁52-60。

辭不就。原函云：「主席鈞鑒：頃間侍座，承以國府委員之任，諄諄相勉，厚蒙眷顧，感何有極！斯年負性疏簡，每以不諱之詞上陳清聽，既恕其罪戾，復荷推誠之加，知遇之感，中心念之。惟斯年實一愚戇之書生，世務非其所能，如在政府，于政府一無裨益；若在社會，或可偶為一介之用。蓋平日言語但求其自信，行跡復流於自適。在政府或可為政府招致困難，在社會偶可有報於國家也。即如最近東北事，政府對蘇聯不得不委曲求全，在社會則不妨明申大義，斯年亦曾屢屢公開之。此非一旦在政府時所應取，然亦良心性情所不能制止，故絕非政府材也。參政員之事，亦緣國家抗戰，義等於徵兵，故未敢不來。今戰事結束，當隨以結束。此後惟有整理舊業，亦偶憑心之所安，發抒所見於報紙，書生報國，如此而已。斯年久患血壓高，數瀕於危，原擬戰事結束，即赴美就醫，或須用大手術。一俟胡適之先生返國，擬即就道，往返至少三季，或須一年。今後如病不大壞，當在草野之間，為國家努力，以答知遇之隆。萬懇鈞座諒其平生之志，從其所執，沒生之幸。」同月五日，先生致夫人函中，亦提及其事，略云：「蔣先生與（陳）布雷談，布雷說：『北方人不易找到可做國府委員者，黨內外皆如此。』蔣先生說：『找傅孟真最相宜。』布雷說：『他怕不幹吧。』蔣先生說：『大家勸他。』因此我向布雷寫了一次信，請他千萬不要開這玩笑。我半月前寫的那篇〈中國與東北共存亡〉，有個附帶目的，即既發這樣言論，即不可再入政府了，落得少麻煩（人家來勸）。經過如此，我並未向人說，報上所傳，皆揣摩，或亦有所聞而言之也。」

(五)三月，出席國民參政會第四屆第二次大會。

(六)五月四日，由重慶飛北平，辦理北京大學遷校事。先生自代理北大校長，曾屢次發表聲明，決不錄用偽北大教職員。偽員雖力謀反對，終未得逞。先生於一月七日致夫人函中略云：「北京大學可以說是兩頭著火，昆明情形已如上述，究竟如何自聯大脫離，大費事，正想中。而北平方面，又弄得很糟，大批偽教職員進來。這是暑假後北大開辦的大障礙，但我決心掃蕩之，決不為北大留此劣跡。實在說這樣局面之下，胡先生

辦遠不如我，我在這幾月給他打平天下，他好辦下去。」僞北大校長鮑鑑清附敵有據，河北高等法院判其無罪，先生於七月搜集鮑四項罪行證據，向河北高院提出抗告。秋，北京大學由昆明遷返北平。

(七)傅樂成記述先生在「屏除僞教職員和檢舉漢奸」一事云：「孟真先生的兩次聲明，在北平引起甚大的騷動。僞教職員以罷課爲要挾，不承認「徵調」，並向北平行營主任李宗仁請願，鬧得烏煙瘴氣。僞北大教授容庚並在報端發表致孟真先生的公開信，爲僞員辯護。容的話雖然荒唐可笑，但在僞教職員看來，則是至理名言，同時也頗能博得一般不明大義的人的同情。

在這種情形，孟真先生想貫徹他的主張，自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他憑了他的勇氣和毅力，加以政府的堅決支持，終能使北大在北平順利復課。原來僞北大的學生，經過甄試，有一部分進入北大，繼續求學。至於僞教職員，則始終未能達到他們的目的。三十五春，蔣主席（今總統）到平，孟真先生陪他遊文丞相（天祥）祠，並在祠中正殿的「萬古綱常」匾額下，共攝一影。這等於告訴北方的僞員漢奸們，蔣主席重視民族氣節，對背叛國家的人是不會輕恕的。而這件事也給予孟真先生一種精神上的甚大支持。

北平是北方漢奸的淵藪，抗戰勝利後，政府雖曾在北平逮捕大批漢奸，但其狡黠者，往往假造證據，自稱曾參與地下工作，於國有功。甚至少數不肖的政府官吏，也爲他們說情。因此政府對漢奸的處置，有些地方不能令人滿意。例如僞北京大學校長鮑鑑清附敵有據，而河北高等法院判決其無罪，以致輿論譁然。孟真先生乃於三十五年七月，找出鮑的四項罪行證據，向河北高等法院提出抗告。並於同月十七日致函當時的司法行政部長謝冠生先生，說明他對審判鮑鑑清及巨奸王蔭泰等的意見。

其後鮑鑑清由河北高等法院檢察官聲請再審，結果如何，現無資料可查。王蔭泰似乎被判重刑，但未處死。錢稻蓀被處何刑，亦已不復記憶。此外孟真先生對僞新民會副會長張燕卿的判決無罪，也曾公開表示不滿。

據說張曾為政府做地下工作，因而將功折罪。但孟真先生認為張在華北的罪行，僅次於三王（王揖敏、王克唐、王蔭泰），地下工作即使有此一說，亦只能據以減刑，而不能全部免罪。張如不繩之以法，其他漢奸均可不予治罪。

從上面的事，可以看出孟真先生對偽員漢奸態度的嚴正和立場的堅決。北平的報紙曾說他對偽教職員抱有一種不共戴天的忿怒」，雖是句玩笑話，卻頗能傳神。自然也因此得罪許多人，但他一切不顧。他曾說：「我知道恨我的人一定很多，但我卻不作鄉愿！」

『不作鄉愿！』實在是今日每個讀書人所應牢記的一句話！」

(八)是時國內外局勢紊亂，各地學潮時起。先生於八月四日在北平《經世日報》發表〈漫談辦學〉一文，其中論及學潮，略云：「這些年來，學校紀律蕩然，不知多少青年為其所誤，風潮鬧到極小的事，學生成了學校的統治者。這樣的學校，只可以關門，因為學校本來是教育青年的，不是毀壞青年的。大凡學生鬧事，可分兩類：一、非政治性的。非政治性的風潮，每最為無聊，北大向無此風。二、政治性的風潮。政治性的，必須要問是內動的或是外動的。去年年底我到昆明去處理學潮，在最緊張中，老友笑對我說：『請看剃頭者，人亦剃其頭。』這因為我是五四運動之一人，現在請人不鬧風潮，故以為可笑也。當時我對朋友說，五四與今天的學潮大不同。五四全是自動的，五四的那天，上午我做主席，下午槓著大旗，直赴趙家樓，所以我深知其中的內幕，那內幕便是無內幕。現在可就不然了，某處（樂成謹案：「某處」指延安。）廣播一下，說要求美軍撤退，過了幾天，學生便要求美軍撤退，請問這是「為誰辛苦為誰忙？」這樣的學生運動，我是很不願意牠和五四相提並論的。我們不當禁止青年作政治運動，但學校應該是個學校，應該有書可讀，若弄得成了政治鬥爭的工具，豈不失了學校存在的意義？青年人多是不成年的人，利用他們，豈不是等於用童工？教員有他的職業的本份，就是好好教書，若果志不在此，別有所圖，豈不是騙人？騙人者不可為人師。受騙者，應該先開導他，開導不成，必需繩之以紀律。今人皆知五四趙

家樓之一幕，而忘了護校之一幕，豈不可惜。」（樂成謹案：此文不載「傳孟眞先生全集」，知者亦少，特錄其精要，以廣流傳。）（編者按：此見傳樂成著〈傳孟眞先生與五四運動〉）。

(九)夏，胡適返國。九月，先生卸去代理北大校長職。是月二十日，北大教職員舉行茶會，表示惜別。席間胡適對先生一年來爲北大盡瘁工作，備致稱揚。教授亦相繼致詞，謂先生在西南聯合大學時代力謀恢復北大文科研究所，復員後又爲北大廣延教授，增加數倍之校舍，至足感謝。先生則謙稱：過去爲北大辦理成功之事，百分之七十爲機會，百分之三十爲努力；所謂百分之三十之努力，亦爲教授不辭萬里歸來之結果。二十九日，先生自北平飛南京。

(十)八月，兼任「北平圖書史料管理處」主任。

(十一)冬，歷史語言研究所由四川李莊遷返南京。

(十二)出席首屆國民大會。

程滄波云：「卅五年制憲國民大會開會時，他是一位代表，幾千人的會場，是中國自合議制以來的一個大考驗。孟眞對立法院委員人數，提出一個修正案，他覺到七百餘人的立法院，將來極難執行審思的職責。他這一個修正案，在亂轟轟的會場中，糊裏糊塗否決了。從那次以後，我很少見他在會議中有何活動。」<sup>49</sup>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1947年） 五十二歲

(一)主持史語所務。

(二)二月，先生於《世紀評論》發表〈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開不可〉一文，痛陳「政治的失敗不止一事，而用這樣的行政院長，前有孔祥熙，後有宋子文，真是不可救藥的事。」而宋的黃金政策、工業政策、對外信

<sup>49</sup> 《傳孟眞先生年譜》頁60-64。

傳樂成，〈傳孟眞先生與五四運動〉、〈傳孟眞先生的民族思想〉（見氏著《時代的追憶論文集》頁129-140）；頁157-161。）

《傅斯年文物資料選輯》頁237。



用，辦事態度更是荒謬。「今天能決定中國將來之命運者，……而在自己。要做的事多極了，而第一件便是請走宋子文，並且要澈底肅清孔宋二家侵蝕國家的勢力。否則政府必然垮臺……。」各地報章紛紛轉載，舉國注目，宋氏旋即辭行政院長職。

1.屈萬里云：「抗戰期間，他任參政員時，屢次攻擊那時的行政院長孔祥熙。到最後不可開交時，蔣委員長（編者按：即後來的蔣介石總統）乃宴孟眞先生想替孔祥熙說情。『你信任我嗎？』蔣委員問孟眞先生。『我絕對信任』。傅先生答。『你既然信任我，那麼就應該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委員長我是信任的。至於說因為信任你也就該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麼，砍掉我的腦袋，我也不能這樣說』！傅先生顯得有些激動，在座的人都失了色，蔣委員長也爲之動容。不久，行政院長便換了人。這一段事實，說明了孟眞先生剛直的氣概，說明了總統能容納直諫之士。」

2.程滄波評其事云：「我想孟眞與孔宋一場鬥爭，是國民政府政治潮派上一個重大的段落。國民黨執政二十餘年，在黨內黨外，自來存在著一種鬥爭，便是士大夫與買辦階級的爭持。這兩類人物，思想背景，行爲表現，乃至生活習慣，氣味標準，格格不相入。盈虛消長，與國民黨的黨勢和整個國運，都有關係。孟眞是士大夫階級中一個代表人物，也是此一鬥爭中的一員前線鬥士。若說孟眞在此一段政治活動中是受人利用，那就是中國幾千年文化傳統力量的利用，也是中國數千年士大夫階層空氣的驅策。孟眞是『五四』時代的代表人物，他受過西洋文明的深厚陶化，同時因為讀過中國書太多了，中國文化的傳統，對他無形中是特別濃厚。『五四』到抗戰勝利，經過三十年的歲月，孟眞這一場奮鬥，決不是戲笑怒罵的博人喝采，也不是什麼文章的精采，有如晚清江春霖輩的奏章。它代表了一種時代意義，它也透露了一個時代的重要消息。中國士大夫中的『通才』，有許多特點，是和西洋自由主義者共同的。易經：『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又說：『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中國的士大夫，不是代表那一個階級，它與歐洲的『中產階級』絕不相同。士大夫階層的意識，隨著時代而不同，但是它必然代表了多數人的意見，

必然注重『公平』的原則，更沒有忽視了『進步』或『改造』的需要。『自強不息』就是天天求進步，謀改造。士大夫沒有『既得利益』，士大夫是要打破『既得利益』的。國民黨先天與後天，都包含著深厚的中國文化傳統，也繼續網羅了中堅的士大夫階層，中山先生就是一位標準的『學通天人』之中國士大夫。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中，明明白白揭櫫打倒『買辦階級』。孟真從歐洲學成歸國，適當國民黨改組之初，而且他執教的地方，是初期的中山大學。他是一個極端的愛國者，他所受的中國文化與西洋文化，驅策他於學術研究以外，畢生做了一件轟轟烈烈的奮鬥。歷史，真理，不因任何時代或權力而磨滅，孟真在這一段中國歷史的地位，是確立不能搖動的。他融和了中國文化傳統及西洋文明，在廿世紀中葉，在中國政治文化及社會的原野上，從事這樣一次重大的運動。孟真今天雖死，而孟真精神是不死的，自由中國的將來，一定是融和著中西文化的傳統，對時代環境作著適應的表現。」

(三)四月，爲子仁軌題紀念冊云：「做人的道理，不止一條，然最要緊的一條是：不可把自己看重。凡事要考量別人的利害，千萬不可自己貪便宜；做事要爲人，不是爲自己。自己爲衆人而生存，不是衆人爲自己而生存。小時養成節儉的習慣，大了爲衆人服務。」

(四)六月，赴美養病，夫人及子仁軌同往。<sup>⑤</sup>

##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1948年） 五十三歲

(一)在美養病。先生自去歲赴美，入波士頓（Boston）白利罕（Peter Bent Brinham）醫院治療，前後住院三四個月。出院後，體重減輕三十磅，血壓大致正常，惟醫生堅囑勿再任行政工作，以免復發。旋移居康乃提克州（Connecticut）之新港（New Haven），平居以讀書買書爲樂，亦偶至

⑤ 《傅斯年全集》第五冊，頁317-325。

《傅孟真先生年譜》頁64-66。

《傅故校長哀輓錄》，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民國40年（1951年）6月初版，頁15-16。

耶魯（Yale）大學演講。先生並於是歲上半年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及立法委員。

屈萬里云：「這一屆的立法委員選舉，他當選為立法委員。那時他正在美國養病，一再表示不就此職，直到回國後仍然堅持著不就。當局因為他是人望所歸，一定要羅致他，於是託陳雪南先生敦勸他，他才做了立法委員。」

(二)八月，由美歸國。主持歷史語言研究所務。

1.陳槃云：「師以久病血壓過高，於三十六年六月下旬，偕俞夫人及公子仁軌赴美療養，翌年秋八月返國。當返國有期而尚未成行之際，有某君者，自京中貽書夫人，謂大廈將傾，傅先生欲於此時遯歸，非計之得。師省書嘆曰：『此君乃不知吾心。余絕不託庇異國，亦不作共黨順民。將來萬一不幸，首都為共黨所乘，余已無可奈何，則亦不辭更適他省，又不得已則退居窮鄉。最後窮鄉亦不保，則蹈海而死已矣。』由此一事言之，則師之矢志報國，視死如歸，固早既情見乎辭矣。」

2.董作賓云：「民國三十七年度，史語所研究人員共五十八人，連職員共八十四人，比社會、地質兩所多三十人以上，比動物、植物、化學、工程四所多一倍以上，比數學、物理、氣象、醫學四所多二倍以上，比天文所多三倍以上，比心理所多九倍以上。史語所作工的人多，因而『出貨』也多，二十三年之間，已刊行的專書，共有七十六種，已發表在集刊、報告中的論文，共有五百多篇，裝起來兩書箱，擺起來一書架。因此，那些兄弟所們，在敬、畏、妒、複雜情緒之下，不能不共尊他是老大哥，稱之曰『大所』。」

(三)秋，出席首屆立法院會。

(四)冬，戡亂戰事失利，首都危急，先生傷時憂國，加以故舊零落，精神大受刺激，遂有自殺殉國之念。

1.陶希聖云：「在徐蚌戰事失利之後，我到雞鳴寺去看孟真；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圖書都在裝箱，他的辦公房內也是箱篋縱橫。他告訴我說：『現在沒有話說，準備一死』。他隨手的小篋裏面藏著大量的安眠藥片。」

2.陳槃云：「當首都倉皇之日，同時有陳布雷，段錫朋二氏之沒，師因精神上大受刺激，悲觀至極，頓萌自殺之念。而師卒未於此時殉國者，賴傅夫人愛護防範之力也。」

(五)冬，遷歷史語言研究所至臺灣楊梅鎮。

陳槃云：「國家多難，研究所展轉播越者數矣。始則由平遷滬，遷京；繼則由京而長沙，而桂林，而昆明，而南溪。復員後，始重返南京。案本所同事凡數十，圖籍古物，箱以千計，雖崎嶇間關，艱難萬狀，而公物得以保全無恙，學術研究得以進行不輟，師之功大矣。然而師之心力，瘁于是矣。洎三十八年冬，（樂成謹案：「三十八年」應作「三十七年」。）首都告警，群情惶急，不知所以為計。一日，師召集同仁會議，慘然曰，研究所生命，恐遂如此告終矣。余之精力既消亡，且宿疾未瘳，余雖欲再將研究所遷至適當地區，使國家學術中心得以維持不墜，然而余竟不克負荷此繁劇矣。今當籌商遣散，雖然如此，諸先生之工作，斯年仍願盡其最大努力，妥為紹介安置。同仁此時，以學術自由之環境，既已感受威脅，於多年生命所寄託之研究所，亦不勝其依戀可惜，一時滿座情緒，至嚴肅悲哀，有熱淚為之盈眶者。師於是不覺大感動，毅然曰，諸先生之貞志乃爾，則斯年之殘生何足惜，當力命以副諸先生之望耳。本所遷移之議，於是遂決。研究所首先決定他徙，既則研究院各所亦有此意嚮，但或主遷桂，或主遷川，莫衷壹是。來臺之議，自孟真師發之。或言臺灣民情隔閡，二二八事件可為前鑑。師決然曰：選擇臺灣即準備蹈海，何慮之有！」

(六)是歲先生在《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發表之論著，有 1.北宋刊南宋補刊十行本史記集解跋 2.後漢書殘本跋等篇。（均收入《傅斯年全集》第三冊）

那廉君記先生為史語所收購「北宋刊南宋補刊本史記」之經過云：「記得抗戰勝利後，傅先生準備為史語所收購傅沅淑所藏的「北宋刊南宋補刊本史記」，傅先生並不因為這部書出自『藏園』，而就認為沒有問題。所以他自己鑒定之後，又請幾位先生看，最後派我到上海請教徐森玉先生，

由徐先生說出這部書的來歷，然後才作決定。這部書買到之後，傅先生又很鄭重的把它放在胡適之先生家裏，又託胡先生設法託人由飛機帶到南京。到了南京之後，特地買了一只保險櫃，把這部書和同時在上海買的蝴蝶裝《文苑英華》以及敦煌卷子等一併放在裏面，自己還寫了一篇跋語。雖然傅先生主張這樣的收藏，但絕不是藏之篋中秘不示人的。傅先生對於買書的謹嚴和對於書的珍視，於此可以想見。」<sup>⑤</sup>

## 中華民國三十八年（1949年） 五十四歲

(一)主持歷史語言研究所務。

陳槃云：「中央各機構遷臺之初，經費無所著，僅賴本省銀行暫時之借墊。既則臺行窮於支應，此款亦聲明停付。研究所同仁聞訊，大起恐慌。師自臺大貽槃手書，囑轉告楊梅所中同仁，可安心工作。謂有如同仁至於絕糧，則渠亦不食。由於師之設法，及院當局之努力負責，本所經費難關，卒安然渡過。」

(二)一月二十日，就任國立臺灣大學校長。

(三)是年初，戡亂戰事急轉，蔣總統引退，由李宗仁任代總統，急謀和議。先生於二月四日致書李氏，力陳和議之非。

(四)先生為臺大教授黃得時書一短幅，曰「歸骨於田橫之島」。具見先生志節之高，蓋久有蹈海之意矣。（樂成謹案：先生嘗語孟博先生曰：「共黨必敗，然余必不返矣！」）又常問姚從吾教授何時一起跳海。

(五)十一月，歷史語言研究所發掘臺灣大馬璘遺址。

(六)是歲，先生在《自由中國雜誌》、《臺灣大學校刊》及臺灣《新生報》發表之論著，計有：1.自由與平等 2.蘇聯究竟是一個什麼國家？（以上收入《傅斯年全集》第五冊） 3.臺灣大學選課制度之商榷 4.臺灣大學與學術研究 5.臺灣大學一年級新生錄取標準之解釋 6.國立臺灣大

⑤ 《傅孟真先生年譜》頁66-70。

學第四次校慶演說詞等篇。(以上收入同上書第六冊)<sup>②</sup>

〈國立臺灣大學第四次校慶演說詞〉的主要內容是：「今天是國立臺灣大學第四次校慶，我因為到校還不滿十個月，最初也不知這個校慶的日子是如何定的，後來才打聽到這是民國三十四年接收前日本臺北帝國大學的那一天。我當時就想；拿這個日子作校慶，對嗎？經過一番考慮，我的結論是：這個日子應該作我們的校慶。」

誠然，我們現在這個大學的建設，絕大部分是在日本時代成就的，而且在日本時代這個大學也有些學術的成就，偏偏不幸的很，這四年來我們這個大學的進步不能算快，所以我們今天拿接收的日子作校慶，心中不無慚愧！但仔細想起來，日本時代這個大學的辦法，有他的特殊目的，就是和他的殖民政策配合的，又是他南進政策的工具。我們接收以後，是純粹的辦大學，是純粹的為辦大學而辦大學，沒有他的那個政策，也不許把大學作為任何學術外的目的工具。如果問辦大學是為什麼？我要說：辦大學為的是學術，為的是青年，為的是中國和世界的文化，這中間不包括工具主義，所以大學才有他的自尊性。這中間是專求真理，不包括利用大學作為人擠人的工具。由日本的臺北帝大變為中國的國立的臺灣大學，雖然物質上進步很少，但精神的改變，意義重大。臺灣省既然回到祖國的懷抱，則臺灣大學應該以尋求真理為目的，以人類尊嚴為人格，以擴充知識，利用天然，增厚民生，為工作的目標。所以這個大學在物質上雖然是二十多年了，在精神上卻只有四年，自然應該拿今天作我們的校慶。

國家在這一年中，非常辛苦，而且可以說是非常悲慘，我們也就在這個悲慘中渡過一年。但將來是大有希望的，真理必定戰敗魔術，愛國必定戰敗賣國者，中國民族五千年文化，必定不會泯滅，我們的大學一定要在這個中間盡他應盡的責任。……

② 《傅孟真先生年譜》頁70-72。

《傅斯年文物資料選輯》頁238。



諸位應該作到的第一件事，是敦品。敦品又可以說為「敦厚品行」。一個社會裡品行好的人多自然這個社會健全，好的人少，自然這個社會危險。青年是領導下一時代的，他們的品行在下一個時代的影響必然很大。大凡人與人相處，許多事情，與其責備人家，毋寧責備自己，責備自己的第一件事是自己是不是守信。在政治上，立信是第一要義，在個人也是如此，說話不算話，必然得不到好結果。……所以立信是做人做學問一切的根本，也是組織社會組織國家一切的根本。我今年雖是五十多歲的人，但是豈能無過，大過且有，何況小過，所以很希望跟諸位共同努力，假如我有說話靠不住的地方，開空頭支票的地方，務盼諸位向我說明，如果中間出于誤會，我當解釋明白，如果我有失信的地方，我必立即改正。

第二件希望諸位的是力學，諸位要想一想，在這個苦難的時候能有這樣一個環境，已經算很有福氣了！這個遭遇，這個環境，是萬萬不可辜負的。在我這樣年齡，一年就是一年，在諸位這樣年齡，一年有十年之用，將來一輩子靠著在大學的這幾年，這是萬萬不可把他放鬆過的。這些年來，大學裡最壞的風氣，是把拿到大學畢業證書當作第一件重要的事，其實在大學裡得到學問乃是最重要的事，得到證書乃是很次要的事。……諸位由學術的培養達到人格的培養，尤其是不可以忽略的。須知人格不是一個空的名詞，乃是一個積累的東西，積累人格，需要學問和思想的成分很多。

第三件我希望諸位的是愛國。這一點本來不必說，大家的本能如此。但是到了重要關頭，更應該看得清楚，我們這民族在世界上有一個特殊現象，現在世界上的民族中，沒有一個文化像我們這樣久遠而中間不斷的，我們不可以辜負我們這個文明先覺者的地位。我們這一百年來，受盡各種帝國主義的折磨，小的不必說，大的如英國帝國主義，日本帝國主義，帝俄和蘇聯的帝國主義，折磨到現在，越來越兇，更是危險，前兩個已無力量，後一個卻正在厲害動作中。我們現在要看清我們的面孔，想到我們的祖先，懷念我們的文化，在今天是決不能屈服的。

第四件希望是愛人。愛國有時不夠，還須愛人。愛國有時失于空洞，雖然並不一定如此，至于愛人，卻是步步著實，天天可行的。孟子說：「無惻隱之心非人也」，愛人的觀念本是從這個心理基礎上起的。每天都有實行我們愛人的例子，每一件事都有實行我們愛的原則的機會。克服自私心，克服自己的利害心，便可走上愛人的大路，只要立志走上這個人道的大路，無論一個人的資質怎麼樣，每人都有作到釋迦牟尼或耶穌基督或林肯或 國父孫中山先生的機會，至少分到他們的精神。

以上所說的四件事，敦品、力學、愛國、愛人，或者有人覺得不過是老生常談，但老生常談有何不好？只看你能做到幾分。

附帶向諸位說一件事：一個大學必須大家要辦好，才能辦好，便可以辦的好，決不是校長要辦好的。我所謂大家者包括全校教職員學生工友在內。<sup>⑤</sup>

## 中華民國三十九年（1950年） 五十五歲

(一)主持臺灣大學校務及歷史語言研究所務。先生在臺大，夙夜憂勤，力謀改進，校務蒸蒸日上，深受師生之愛戴。

1.教授屈萬里記先生改進校務之情形，略云：「中日學制不同，日本大學的設備是不完全適合於中國大學的，中國大學一年級的全部課程和二年級的大部份課程，在日本，都已於高等學校裡修習了。所以由『臺北帝大』變成的臺灣大學，關於一、二年級應有的設備，如大教室、普通儀器、一般性的圖書等，或者壓根兒沒有，或雖有一些而距離實際需要甚遠。因而建築大教室，補充圖書儀器，乃是刻不容緩的事。孟眞先生到校後就針對著這一方面，努力去做。去年夏天，已完成了十二間大教室；到現在為止，普通的圖書儀器，都已有大量的補充。在設備方面，勉強可以應付教學之用了。『臺北帝大』所遺下的第二個難題，是學生宿舍的

---

⑤ 《傅斯年全集》第六冊，頁226-231。編者按：文中的「力學」，後來改為「勵學」。詳見《臺大校刊》第45期，民國40年（1951），4月8日。（李東華：〈勳績盡瘁，死而後已：傅孟眞先生在台大〉，本期學報，頁146。）

缺乏。學生由『臺北帝大』的數百人，已增加到現在的三千多人。大部的學生都沒有宿舍可住，影響學業至大，這情況是非常嚴重的。於是孟眞先生又費盡心力，籌建學生宿舍。從他到任時起，就忙著這件事；到現在止，所有的學生宿舍，已能容納兩千人以上。學生住宿問題，至是又算解決了。他最敬重讀書人，他聘請教員非常慎重，也可以說對於教員名義的給予，是非常吝嗇的。對於好的教授，他百計千方地邀請他；可是也有不少大力的什麼委員什麼長之類的人，欲在臺大求一教職而不可得。兩年來臺大增加了不少的名教授，而同時孟眞先生也得罪了不少的人。他這作風，不僅對學生的學業，有重大的影響；同時也把多年來爲了窮而被人輕視的教員身份，無形中給提高了。教員是社會上的清流，士風關係國運，這對國家的影響是非常重大的。他對於招收學生之認真，眞可以說是無以復加了。介紹學生而不由考試入學的事，固然絕對沒有；但就考試說吧，出題時之審慎，和印題時關防之嚴密，迥非外人所能想像。印題的場所，門窗都糊得撒土不透，室外密布著崗警。有人用『如臨大敵』四個字來形容它，卻恰到好處。兩年以來，筆者曾在這臨時監獄裡坐過三個整夜。關於公費生名額之爭取，擴充學生各種獎助金，他都不遺餘力。對於生病的窮苦學生，他想盡方法幫助他們。對於成績優越的學生，他眞能愛才如命。對於職員的任用，他的作風也和別人不同。除了具有信託關係的人員之外，多半是經由考試的方式錄用的。沒有眞正作事能力的人，無論什麼大力的人所介紹，他相應不理。可是，有許多毛遂自薦的人，經過詳細地談話之後，卻被他錄用了。有些人是因爲在報紙或雜誌上發表文章，這文章被他欣賞，因而邀請來的。前任主任秘書現任總務長黃仲圖先生，原來與孟眞先生並無一面之緣，孟眞先生被發表做臺大校長時，黃先生曾函孟眞先生，述說他對於整理臺大的意見，這意見被孟眞先生所賞識，於是經過了幾度面談之後，黃先生就被聘爲主任秘書。『用人惟才』，孟眞先生眞能說得到做得到。臺大六個學院，都還在整頓時期；加上圖書館、熱帶醫學研究所、附設醫院、實驗林管理處等龐大的附設機構，經常的事物，已經繁劇不堪了。兩年以來，

意外的事故，又層出不窮。諸如房產的糾紛，匪諜案件，附設醫院各種事件，紛至沓來。尤其楊如萍的竊案，使他傷透腦筋。他平生最恨貪污，卻不料想臺大裡也有這種貪污事件之發生，他精神上已負了很多的創傷。而且，關於楊案的公文稿，很多是他親自撰擬的，文稿之長有的達萬字以上。『百憂感其心，萬事勞其形』，患血壓過高病多年的孟真先生，怎樣能受得住呢？]

2. 學生趙元暉記述先生對學生之愛護，略云：「傳校長在我們同學的心目中已不僅是一位校長，他已經是臺大家庭中的家長，已經是同學們的親人。他平日除去辦理校務外，還兼管著同學們的生活，就像父親還兼做著母親的事情一樣。傳校長的心中，也只有我們同學。他自從來臺大以後，爲了整頓臺大，把他自己的事情都擱置了，譬如他本來想寫些東西，但所有的時間都讓給了臺大，只好暫時擱置。校長初來臺大時，學校因接收不久，一切混亂，校舍破爛不堪。他第一步就是修理校舍，擴建教室，臺大現在已能容納三千多學生在上課。起初，校舍裡面情形一場糊塗，不論教室、研究室以至於洗澡間都住有學生。他覺得要想同學能安心讀書，必得要有安定的生活環境，所以下決心要修建學生宿舍，現在宿舍已全部完成，全校同學要想寄宿的大致都能寄宿了。爲了這事，外面有人攻擊得很厲害，但就我們同學來講，我們深深感謝校長的措施，有了宿舍，我們生活有了規律，可以節省許多時間。理工學院的學生對於時間一分一秒都是寶貴的，如何有那麼多的時間花費在走讀上，所以這種情形非校外人能夠了解的。爲了宿舍問題，校長忍受別人的攻訐，而我們同學都是受惠，更不妨說是在享福。校長關心我們同學的生活不妨舉一個例，那便是對待我們學校患肺病的同學。在前學期學校舉行了一次全體學生愛克司光檢查，結果發現有幾十位同學都患有並不太輕的肺病。他著急非凡，馬上命令在校園內空氣好的地方讓出幾間房子，做同學的療養室，派有工友服侍。病重者准許休學，公費照發，病輕者准許退選一部學分。另外學校每月贈給每位同學奶粉兩罐，魚肝油兩瓶，菜金三十元，其他校內福利，肺病的同學皆有優先權，現在有些同學已

漸漸好了。臺灣籍的同學原不准領匪區救濟金，但校長爲顧及其中有不少家境貧寒的，於是又設了臺灣省籍獎學金，這筆錢都是由校方經費中節省下來的。大學校長能夠苦心孤詣的爲同學這樣關心，真不多見。校長平日最關心學生的功課，考試制度之嚴，爲他校所罕見。我在讀大一時，考試時都要編號，尤其英文又分月考、大考、及統考。我那時真覺得他未免過於認真，心裡不免稍不高興，但是等我升了二年級以後，所用的課本都是難懂的原文，我才知道他以前那種苦心的原因了，心裡說不出的慚愧與敬服。平日校長對功課好的有種種獎勵，每年對成績優良者給獎勵或獎狀。假使你在學校裡出了亂子，校長第一件事就是叫註冊組送成績單給他，如果成績好的，不妨稍加『考慮』，如果功課又是糟糕，那你準得倒霉了。校長更注重同學的課外活動，凡是同學組織的社團對康樂有貢獻的都給予津貼，每學期都舉行運動、論文、演說比賽。每次論文比賽的卷子都要經過他親自審閱，待與教授商量過後，才作最後決定。其餘他最發生興趣的是英語演說競賽，他每次都去旁聽。我最敬服校長的還是他的民主作風，他自從出長臺大以來，一直是拿民主的辦法來搞的（對付共產黨是例外）。平常他含著一個煙斗在學校裡跑來跑去，有次他跑到生物實驗室去，看見同學正在看草履蟲，他說：『我在倫敦的時候也看過的』。有位同學開玩笑說你吹牛，他哈哈大笑而去。有時他跑到校內合作社去買麵包吃，常常給同學敲竹槓請客。平常他希望同學多多寫信給他，他總給予滿意答覆，我自己就曾經寫過幾封信，措詞並不太客氣，但很快就得回信，措詞還非常客氣呢！假使同學私人經濟實在困難去找校長，他也肯幫忙的。他最恨的，就是貪污，假使有人報告某人貪污，他決不客氣。我們的校刊上，每期都刊載著他的巨大廣告，籲請教授、職員、工友、學生、檢舉貪污。如果傅校長出來從政，必定也是一個最賢明的好官。」

3. 學生林恭祖云：「傅校長是懂得青年心理的人，他體諒我們的困難，但如果同學的要求超過某限度以外，他會用方法勸導，俟我們心悅意服。記得校長來校接任不久，因爲時局的急轉，外籍的同學都快要斷了炊，



幾位同學代表去見校長，要求接濟，校長馬上答應。以後同學嫌數目太少，強著要求增加，校長就誠懇勸我們要知道滿足。最後他說：『你們別以為我是校長……汽車是公家給的，香煙是土製……穿的又是十幾年前的舊衣。』同學看看他那破舊的西裝，都默默的退出了。他是最不會擺架子的人，他關心同學的生活，更喜歡和同學接近。校長辦公室的後邊，就是福利社和食堂，他每每趁著中午下辦公的小空間到食堂參觀同學用餐，有時在福利社買點蛋糕餅乾，我們就站成一個小圓圈緊緊的圍著他。他一面嚼著餅乾，一面說笑，那種洒落的風度，親切的談話，給我們同學很深的印象。校長又是最寬厚的人，在學校任是什麼人他都一視同仁，兩次校慶大會上都說起『學校的進步，就是靠諸位工人朋友……』的話。據說有一次一位同學有事去見他，到他家裏，卻見他正坐在榻榻米上意興濃濃和車夫下著象棋。」

(二)三月，先生以詩贈臺北市大陸書店主人張紫樹云：「憶昔兩京棲遲日，麻沙卷子盡摩娑，今來海上充祭酒，瀛珠一見輒網羅；紫樹善賈兼善識，論品評值常切磋，祝君泛海求奇本，築室以藏山之阿。」

(三)是歲，先生在《自由中國》、《中央日報》及《大陸雜誌》等刊物發表之論著，計有：1.我們為什麼要抗俄反共？ 2.共產黨的吸引力（以上收入《傅斯年全集》第五冊） 3.一個問題——中國的學校制度 4.中國學校制度的批評 5.關於臺大醫院（以上收入同上書第六冊） 6.國立臺灣大學法學院社會科學論叢發刊詞（收入同上書第四冊） 7.我對蕭伯納的看法等篇。（收入同上書第七冊）。

1.程滄波批評〈我對蕭伯納的看法〉一文云：「蕭伯納死後，世界文壇上追念的文字算是盛極一時。《美國時代雜誌》那兩大頁的論文，算內容最為豐富，而英美書報上所有關於蕭伯納的文章，其議論的精闢，和對蕭伯納思想與人格之剖析清澈，我看孟真所做的〈我看蕭伯納〉是首屈一指。〈我看蕭伯納〉大概是孟真最後一篇文章，這一篇短短的文章結束了孟真三十年的文字生涯；這一篇文章，是孟真『等身著作』的壓檯戲。孟真在那篇文章中說：他不是學戲劇，他也不是學文藝批評。但是，像



蕭伯納這樣一個題目，不是一個專家寫得好的。這樣一個複雜、迷亂、幻景的題材與人物，不是具有豐富的中西學識，超特的智慧，是沒法下刀劈下去的。孟真那一篇文章，把一個蕭伯納，一刀劈下去了。蕭伯納經他這一劈，由神奇而化為舊朽，把蕭翁一生的魔術全揭穿了。孟真的不朽，那篇文章就夠了。」

2.毛子水云：「（傅先生）在〈怎樣做白話文〉裏面說：『我們所以不滿意於舊文學，只為他是不合於人性，不近人情的偽文學，缺少「人化」的文學。我們用理想上的新文字代替他，全憑這「容受人化」一條簡單的道理。……所以我們對於將來的白話文，希望他是「人的文學」。近來傅先生在《自由中國》第三卷第十期上所發表的〈我對蕭伯納的看法〉一文，亦可以說是這個「人化」文學的主張的表現。違返人性的文學不是「人化」的文學；空洞無物的文學亦不是「人化」的文學；「七寶樓台」，僅可作為茶餘酒後的賞玩的，更不是「人化」的文學。我在傅先生逝世前一天曾對他說：『這篇批評蕭伯納的文章，可以說是三十年讀書的心得。』這並不是過譽。總之，這篇文章，不特是可以代表傅先生「人化」文學的見解，並且是在世界文學批評史中有極高地位的作品。』

(四) 1.夫人俞大綵女士敘述伉儷生活情形云：「傅夫人告訴記者，他跟傅校長的興趣是完全兩樣的。她在學校的時候，喜歡騎馬、溜冰、打網球、跳舞，還有各種社交活動，但是傅校長卻不然，他從來不會娛樂，他的腦筋裡祇是「書本、書本；工作，工作」。在歷年各地所有的戲劇和電影中，傅校長僅看過幾場卓別麟主演的片子，因為他覺得祇有卓別麟才是真正的藝術家。抗戰期間在重慶住了幾年，傅校長學會了下象棋，自此以後，晚上在家偶然閒暇無事，他便跟司機或工友下象棋。在臺灣，每天晚上十點鐘，他一定要打開收音機來聽『美國之聲』的廣播，此外他的興趣就完全擺在書本上了。為什麼傅夫人會跟傅校長結婚呢？她說最大的理由是她崇拜傅校長偉大的人格。她很謙虛地說：『如果比學問，我真不敢在他的面前抬起頭，所以我願意犧牲自己一切的嗜好和享受，追隨他，陪伴他，幫助他。結婚之後他沒有阻止我任何社交活動，但我完

全自動放棄了。十幾年來我們的經濟狀況一直非常困苦，但我們仍然過得很美滿，很快樂。』』

2.先生姪樂成敘述先生在台之生活，略云：「抗戰以前，在北平及南京，我和伯父同住在一起有兩三年之久。那時服務於教育界的人，還能稱得起為『小資產階級』，生活相當舒適。不過抗戰以後，便轉了個大彎。在重慶時，窮到每餐祇吃一盤『籐籐菜』，有時還喝稀飯。那時正是對日作戰局勢艱危的時候，他還須為國事憂愁忙碌。那種窮、愁、忙的生活環境，使他的黑髮突然變成全白，而『血壓高』的病，也在那時發生。這病緊緊追隨著他，至今已十年了。他曾慨嘆的對友人說：『我是從少年突然進入老年的。』自去年一月他來臺灣後，生活的刻苦，一如往昔。除了宿舍與交通工具由學校供給外，他和伯母的每月收入，都用在吃飯上。碰到急用，就得借錢。有時得點稿費，便大逛書店，買一堆書回來。總之，他經常是囊空如洗的。某個月底的一天早晨，我正在房中看報，聽見伯父在臥室中對伯母說：『有錢嗎？拿拾塊來。』伯母說：『我祇剩幾塊錢了，還得買菜。』伯父說：『那就算了。』過了一會，又聽到伯母問他：『倒底要不要？我好去想辦法。』我在校中偶對同事提起此事，同事皆為之嘆息。誰能想到他們會為拾塊錢去『想辦法』呢？前些時他為《大陸雜誌》寫了一篇文章，得稿費七百元，預備請我們吃頓烤牛肉，剩下的錢做條棉褲。然而又誰能想到他會賣文章來做棉褲呢？他對這種清苦的生活，總是安之如素，我從未見他向人哭窮過。記得在南京將要動身來臺之時，他曾對我說：『今後不要再想以往的生活，我們到臺灣後，要準備過苦工甚至奴隸的生活！』伯父是懷著作苦工作奴隸的決心來臺灣的，所以他對自己的生活，並未感到不滿。相反的，卻時常為別人的生活而著急。他竭力設法幫助清寒的員生，不斷的替人家找工作。常聽他說，某某人家口太多，如何得了。又常常在吃飯時說：『學生們的菜，是一碗清水煮蘿蔔，怎樣夠營養？』有一次他到學生食堂去參觀，看到有位學生在吃牛油，便連忙勸那位學生分給大家吃。他屢次要將家中每月剩餘的米和煤送給學生食堂，總因為數過少，沒有好意思送去。一次有人告訴

他某人有西裝數十套，他說『一個人有五套衣服，就足夠了，我真不明白要這麼多的衣服作什麼用？』又有人告訴他某人極有錢，他說：『既然這麼有錢，為什麼不捐出來？』諸如此類的話，有時會令聞者失笑。我的伯父激烈反共，同時也極端痛恨世界上貧富不均的現象，這一點是大家知道的。他經常每日在校辦公六小時以上，一進辦公室，便無一分鐘的休息，有時還須參加校外的集會。他對校務，幾乎是無事不做。校長辦公室的秘書那先生，住在我家中，時常被半夜裏叫起來處理校務。這種辦法，平時即連家中人都不大贊成。他那種希望臺大趕快辦好的意念，竟使他坐臥不安。他在家中，一有閒暇多半是讀書或寫文章。有時用怪腔調哼詩詞，聲震全室，我的伯母常常學他以爲樂。有時在吃飯時獨自微笑，用手在桌上寫字，家中人看慣了，卻不以爲奇。兩年以來，他大概看過電影和京戲各一、二次，他經常的娛樂，便是下象棋。技術雖不精，卻是個棋迷，臺大的楊司機便是他的唯一棋友。二人下得起勁時，『跳馬』『出車』與棋盤砰砰之聲，不絕於耳。有時他還在住宅附近的街上，與『擺棋式』的對壘，自然是損兵折將而還。此外，他頗喜歡逛舊書店，臺北的舊書店老闆，多半與他熟識，他每逛必買，甚至於賒，總不空手而回。我伯母養的幾隻貓，也是他解悶的對象，時常抱著它們向它們講話。有一天，他指著懷中的黃花肥貓對我們說：『在我們家中，它是第一胖，我祇能算第二。』引得大家發笑。除了這三件事算是他閒暇中的娛樂外，所有的時間，是緊張而嚴肅的。他從未在晚十二點以前休息，一兩點就寢是常事，第二天早晨不到八點鐘便起來。午覺並不常睡，偶隔三兩天，在飯後聽到他在房中鼾聲大作，便知道他是疲倦已極，正在尋覓片刻的休息了。晚飯以後，正是他與我們談論天下大事的時候。每值局勢不利，他木然而坐，問半天纔答一句話。近來局面開朗，便笑口常開，有時會自動說出些好消息來。他不肯在國家危難之時，離開臺灣跑到安全的地方去。去年，他到機場送一位親戚赴美，臨別時那位親戚隨便的對他說：『希望不久能在美國相見。』他立刻正色答道：『我要留在臺灣，我是絕對不到美國去的。』弄得那位親戚很難爲情。今年韓戰爆發

不久，他對那秘書說：『前些時局勢非常可慮，不過我還鎮定，我準備必要時一瓶安眠藥作個結束，所幸至今已經有了轉機。』他極端卑視那般無恥的『靠攏』者，若有人報告他某某熟人『靠攏』了，他總是低頭不語。臉上顯出極度痛苦。這類消息，有時比戰事失利對他的打擊還要厲害。關於他的病，三十年在重慶時，曾一度危殆，此後病魔一直纏擾著他。他平常祇以不吃鹽和肉來作抵制，他每餐祇吃點不放鹽的青菜及米飯，有時還吃些鳳梨或柿子。可是這辦法不能澈底實行，一來因為校內及校外的集會太多，二來這種淡而無味的食品也實在難以下嚥。因此在家中吃飯時，筷子常會伸到我們的菜碗裏來，有時還背了伯母去到街頭吃餛飩或包子。他平常向不量血壓，因怕得知病情後而妨礙工作，他為工作把病撇在腦後。今年春天，血壓突然增高；醫生親友無不勸他作長期的休養，但他不聽。夏天他又患膽石症，稍見痊癒便又辦起公來。最近因錢教務長赴法，使他更為忙碌。』

(五)十二月二十日，下午十一時二十分，以腦溢血病逝於臺灣省議會議場。二十一日臺北市《中央日報》記載先生之逝世情形，略云：「傅先生昨天下午二時二十五分列席參議會第五次會議，準備答覆參議員的教育詢問中有關臺大問題。五時四十分，他接著陳雪屏廳長上臺，答覆參議員的詢問。當答覆完教育部搶運來臺存放臺大器材處理，和放寬臺大招生尺度問題後，他還高呼：『我對有才能，有智力而貧窮的學生，絕對要扶植他們。』之後，他說完『我晚上八時不能來開會了』以後，回頭看牆上時鐘已經指向六時十分，於是，他慢步返回座位。當李副議長宣佈散會後，起身欲行離開會場之際，省參議會秘書長連震東趨前和他握手，突然覺他的手冷得可怕，問他是否不舒服，他邊答邊摸腦袋說：「我不行了，不行了！」作頭暈狀。接著劉傳來參議員正想和他握手時，他即暈倒。其時連秘書長、陳廳長、劉參議員及在場參議員見狀急忙將坐椅拼攏，把傅校長扶臥上去。並由劉參議員替他按脈，診悉他血壓甚高，一面促人取冷水貼額，並以其皮包作枕墊起頭顱，一面電告傅校長夫人俞大綵女士，臺大附屬醫院魏火曜院長。六時卅分，魏院長及臺大醫學院代院長葉曙、

內科副教授王文杰、臺大護士長陳翠玉及五名護士聞訊趕到，見傅校長已陷入昏睡狀態，經診斷為腦溢血後，當即施以應急處置，抽血三百CC，時其血壓高至一九〇度。七時廿分，國防醫學院院長盧致德及內科教授丁農，臺大醫學院耳鼻咽喉科教授林天賜，細菌學教授嚴智鐘等，亦聞訊趕到，在互相磋商之下，繼續施以種種救急治療，再次抽血一百五十CC。此時王世杰、陳誠夫婦、何應欽、程天放、羅家倫、吳國楨、朱家驊、雷震、杭立武、倪文亞、鄭通和、李萬居、王祖祥、顏春輝、浦薛鳳、陳雪屏、董作賓、李濟、薩孟武、魏火曜、鍾盛標、彭九生、陳振鐸、傅啓學、黃仲圖、方東美、毛子水、蘇薌雨、余又孫、黃文、英千里、芮逸夫、勞榘相繼聞訊趕來探視。九時三十分鐘，傅校長血壓亦漸降低至一百八十度左右，體溫降至三十八度，情狀比較好轉。王世杰、陳誠夫婦，由羅家倫等勸慰先行回寓。不料到十一時，血壓又變高至二百三十度，體溫又回復四十度，延至十一時廿二分終告不治。傅夫人俞大綵，羅家倫及在場諸人均悲傷痛哭。至十一時卅七分，陳誠夫婦趕來，已不能與他作最後一語。當時即由陳院長及羅家倫先生等諸人主持商討傅氏身後事宜，發訃文，組織治喪委員會，電告在美傅內兄俞大維及子傅仁軌。十二時一刻，代為更衣，遂即移靈到極樂殯儀館。」

(六)十二月二十一日，先生遺體暫厝極樂殯儀館。臺灣大學停課一天，並下半旗致哀。全校師生聞耗，莫不同聲哀悼。

(七)十二月二十二日，先生移體大殮，送往火葬場火化。

(八)十二月三十日，蔣總統明令褒揚先生。

(九)十二月三十一日，治喪委員會及臺灣大學假臺大法學院大禮堂舉行追悼會，蔣總統親臨主祭，並頒「國失師表」輓幛，對此學術界巨星之去世，無限悼惜。各界前往致祭者達五千餘人。

(十)先生之喪，各界致送輓聯二百七十餘幅，輓詩六十餘首，輓詞二十餘首，祭文六篇，中西文悼唁函電九十餘封。

(十一)各報章及先生親友學生著文追悼先生者，亦復不少，計得一百一十餘



篇。其中對先生學行事業，頗多論列。<sup>⑤4</sup>

## 中華民國四十年（1951年）

(一)一月六日，傳故校長籌委會決議①骨灰安葬於校區。②建立銅像。③編印遺著及紀念刊物。

(二)一月二十二日，物理系教授崔伯銓提議鑄紀念鐘一口。

(三)三月二十六日，紀念鐘圖形繪好，即開工鑄造。

(四)四月八日，三十九學年度第二次校務會議，洪炎秋、洪耀勳、蘇薌雨三教授提議，以「敦品勵學，愛國愛人」（傳校長在第四週年校慶演說詞）八字為校訓。

(五)五月一日，傳校長墓亭破土。哀輓錄付印。鐘正鑄造中。<sup>⑤5</sup> 此即後來所謂的「傳鐘」。

(六)六月十五日，國立臺灣大學出版《傳故校長哀輓錄》全一冊。

(七)十二月二十日，國立臺灣大學安葬先生骨灰於臺灣大學植物園，<sup>⑤6</sup> 後來稱為「傳園」。

## 中華民國四十一年（1952年）

十二月，國立臺灣大學出版《傳孟真先生集》，共六冊。

十二月十日，胡適為《傳孟真先生集》作序，他在序文裡說：傳孟真先生的遺著共分三編。上編是他做學生時代的文字，其中絕大部分是他在「新潮」雜誌上發表的文字；其中最後一部分是他在歐洲留學時期寫給顧頡剛先生討論古史的通信。中編是他的學術論著，共分七組：從甲到戊，是他在中山大學，北京大學的講義殘稿，己組是他的專著《性命古訓辨證》，庚組是他的學術論文集。下編是他最後十幾年（民國二十一年到

⑤4 以上見《傳孟真先生年譜》頁72-97。悼念先生之文，有論先生之品格才幹的，如胡適、蔣夢麟、朱家驊、羅家倫、伍倬、李濟、程滄波、毛子水、孫德中、公孫羽、張景樵及新生報社論等。有論先生之學問思想的，如蔣夢麟、程滄波、伍倬、屈萬里等。有論先生之事業成就的，如胡適、勞貞一、新聞天地、公論報社論等。詳見《傳孟真先生年譜》頁97-110。

⑤5 李東華，〈勳績盡瘁，死而後已：傳孟真先生在台大〉，頁151。

⑤6 《傳孟真先生年譜》頁111。



三十九年)發表的時事評論。孟眞曾說:『每一書保存的原料越多越好,修理的越整齊越糟(中編丁,葉四〇)。』這一部遺集的編輯,特別注重原料的保存,從他做學生時期的文字,到他在臺灣大學校長任內討論教育問題的文字,凡此時能搜集到的,都保存在這裡。這裡最缺乏的是孟眞一生同親屬朋友往來的通信。這一部遺著,加上將來必須搜集保存的通信,——他給親屬朋友的,親屬朋友給他的,——就是這個天才最高,最可敬愛的人的全部傳記材料了。

孟眞是人間一個最希有的天才。他的記憶力最強,理解力也最強。他能做最細密的繡花針工夫,他又有最大膽的大刀闊斧本領。他是最能做學問的學人,同時他又是最能辦事,最有組織才幹的天生領袖人物。他的情感是最有熱力,往往帶有爆炸性的;同時他又是最溫柔,最富於理智,最有條理的一個可愛可親的人。這都是人世最難得合併在一個人身上的才性,而我們的孟眞確能一身兼有這些最難兼有的品性與才能。

孟眞離開我們已兩年了,但我們在這部遺集裡還可以深深的感覺到他的才氣縱橫,感覺到他的心思細密;感覺到他的火氣,也感覺到他的愛朋友,了解朋友,鼓勵朋友的真摯親切。民國十五年,孟眞同我在巴黎相聚了幾天,有一天,他大罵丁在君,他說:「我若見了丁文江,一定要殺他!」後來我在北京介紹他認識在君,我笑著對他說:「這就是你當年要殺的丁文江!」不久他們成了互相愛敬的好朋友。我現在重讀孟眞的〈我所認識的丁文江先生〉同〈丁文江一個人物的幾片光彩〉,我回想到那年在君在長沙病危,孟眞從北平趕去看護他的情狀,我想念這兩位最可愛,最有光彩的亡友,眞忍不住熱淚落在這紙上了。

孟眞這部遺集裡,最有永久價值的學術論著是在中編的庚組。這二十多篇裡,有許多繼往開來的大文章。孟眞在「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編庚,葉一六九——一八二)裡,給他一生精力專注的研究機構定下了三條宗旨:

- (1)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進步。凡間接的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創造的系統,而不能豐富細密的參照所包含的事實,便退步。

(2)凡一種學問能擴張他研究的材料，便進步。不能的，便退步。

(3)凡一種學問能擴充他作研究時應用的工具的，便進步。不能的，便退步。

但他在「史學方法導論」(中編丁，葉一——五三)裡，曾指出：

直接材料每每殘缺，每每偏于小事。〔若〕不靠較為普遍，略具系統的間接材料先作說明，何從了解這一件直接材料？(葉五)

若是我們不先對於間接材料有一番細工夫，這些直接材料之意義和位置，是不知道的。不知道，則無從使用。(葉五)

我們要能得到前人所得不到的史料，然後可以超越前人。我們要使用新得材料于遺傳材料之上，然後可以超越同見這材料的同時人。(葉六)

孟真的庚組裡許多大文章都是真能做到他自己標舉出來的理想境界的。試看他的〈新獲卜辭寫本後記跋〉(中編庚，葉一九二——二三五)，他看了董彥堂先生新得的兩塊卜辭，兩片一共只有五個字，他就能推想到兩個古史大問題——楚之先世，殷周之關係——都可以從這兩片五個殘字上得到重要的證實。這種大文章，真是「能使用新的材料於遺傳材料之上」；真是能「先對於間接材料有一番細工夫」，然後能確切了解新得的直接材料的「意義和位置」。所以我們承認這一類的文字是繼往開來的大文章。

我們重讀孟真這些最有光彩的學術論著，更不能不為國家，為學術，懷念痛惜這一位能繼往開來的偉大學人！<sup>⑤</sup>

---

⑤ 此序原刊於《國立臺灣大學校刊》第一九四期，民國41年12月20日，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後來文星書店選入《胡適選集》(四)，文中提到編目頁數均就該集而言，與聯經出版事業公司於民國69年9月出版的《傅斯年全集》重新編排後不同。